

红旗

HONGQ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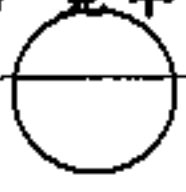
一九六二年 14



红旗

半月刊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办



★ 一九六二年第十四期 ★

目 录

論总结农业生产經驗 馬建猷 (1)

語言学习杂感 曹 昂 (8)

談談共产党员的义务和权利..... 苏 沛 刘家澤 (14)

現代资产阶级的邏輯实证主义哲学..... 任 华 (25)

关于詭辯論..... 邵铁真 (34)

——讀书札記

徒劳的“修漏补缺”..... 席林生 (38)

——从腊斯克波恩之行看美国西德之間的裂痕

漫画: 大西洋伙伴排座次 英 翰 (41)

☆ 七月十六日出版 ☆



論 总 結 农 业 生 产 經 驗

馬 建 猷

我国农业具有悠久的历史，广大农民在长期生产实践中积累了极其丰富的經驗。对这些宝贵的經驗，全面地系統地加以总结 and 运用，是加速我国农业发展的重要条件。

总结經驗，是人們对客观事物从感性認識到理性認識的上升，从现象观察到对事物的内部联系和規律性認識的发展。人們在总结經驗的时候，由于思想方法和知識、經驗水平不同，对同一經驗，可能得出不同的結論和推断。人們所总结的經驗，如果真实地反映了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和規律性，并且在推行这种經驗的时候，遵守因时因地制宜的原则，那就能够对生产起促进作用；如果不是这样，就会給生产带来不良影响，甚至造成損失。因此，在总结經驗的时候，应该采取十分慎重的态度，努力提高总结的科学性。

这里，根据近几年来实际工作中的一些体会，談談在总结农业生产經驗的时候应该注意的几个問題。

一、衡量一項經驗是否合理，应该看它是否有利于提高大面积的和长周期的总产量。

农业生产具有两种周期性总产量：一是一季作物短周期的大面积总产量；二是多种作物組合的复种輪作长周期的大面积总产量。农业生产的目的是提高总产量。在作物布局、复种輪作都合理，作物間不存在爭肥

料、爭劳动力、爭季节的矛盾的情况下，短周期产量变化与长周期总产量变化是一致的，这就是說，只要各种作物的短周期产量都高，长周期总产量也必然高。如果作物布局、复种輪作以及耕作措施不尽合理，例如过多地选用生育期过长的迟熟的丰产品种，或者过分扩大需肥需工过多、消耗地力过大的某些禾本科、薯类等高产作物的种植面积，又不去适当地与那些产量不是很高但能够培养地力的豆科作物实行輪作，这样虽然一季作物能够增产，或者当年总产量能够提高，但是，全年的或长周期的总产量，則不一定能够提高。

以近几年来四川省推广胜利油菜和拱宸桥油菜的情况为例。胜利油菜在試驗田里的产量比拱宸桥油菜高，但胜利油菜具有生育期长、需早播（九月播）迟收（五月始能收）、需肥多等生物学特性。早播产量才能高，而早播由于前作紅苕、水稻等未收获，地騰不出来，只能采取育苗移栽的办法，这就得多費工。迟收，后作水稻不能早栽，对水稻产量有一定影响。需肥多，在肥料有限的条件下，滿足了一部分农田对肥料的需要，則会减少另一部分农田的施肥数量，結果不利于提高总产量。拱宸桥油菜却具有适于迟播（十一月播）、收获早（四月上、中旬收）、需肥少等生



物學特性。遲播，就可以在前季作物收穫後，直接播種，不需要育苗移栽，因而省工。收穫早，水稻能夠早栽，有利於水稻增產。需肥少，有利於保證大面積平衡增產。從試驗田里勝利油菜的產量顯著高於拱宸橋油菜來看，似乎應該全面推廣勝利油菜。但是農民不是這樣作比較。他們是看在大面積一般條件下，哪一品種總產量高；兩種油菜分別與水稻組合，哪一種組合全年總產量高。比較的結果，農民僅將勝利油菜種在極少數的肥沃土壤上，大面積仍然種拱宸橋油菜。

由此可見，有些經驗，孤立地從單一作物短週期的產量來看，可能是增產措施，但從它對長週期總產量的影響來看，則可能是減產措施；同樣，有的作物布局雖然不能大幅度提高當年短週期總產量，有的栽培措施雖然不符合某一作物小面積高產的要求，却有利於大面積平衡增產，提高長週期總產量。所以，衡量一項經驗是否合理，應該看它是否有利於提高大面積、長週期總產量，而不應該片面地以一年總產量、一種作物總產量甚至一種作物的小面積產量來衡量。

農業科學工作者，為了深入掌握一門專業知識，對不同作物和不同耕作措施進行專業研究，以及按一定的專業分工總結生產經驗，是完全必要的。問題在於各專業工作者，在總結本專業的經驗的時候，不應該只局限於本專業，而必須樹立全面觀點，把本專業的作物產量視為總產量的一個組成部分，把自己研究的耕作措施和其他耕作措施聯繫起來進行分析，使局部利益服從整體利益，使單一作物短週期產量服從長週期總產量。如果小麥的研究工作者在總結南方地區小麥豐

產經驗的時候，片面地以一切服從小麥高產為指導思想，很可能只看到小麥產量高於蚕豆、豌豆，過分強調擴大小麥種植面積，忽視豆科綠肥等作物應有的種植面積；也可能不顧水稻的種植適期，不適當地肯定某些不利於水稻適期栽插的晚熟豐產小麥品種，忽視小麥與其他作物間的互利關係。這樣，就不能達到全面增產的目的。水稻的研究工作者在總結水稻增產經驗的時候，同樣應該避免只偏向水稻，不顧其他作物的片面性。在總結其他增產經驗的時候，也應該這樣。例如，在某些無霜期較短的地區，大春作物和小春作物都採用生育期較短的品種，可以一年兩熟；而如果大春作物和小春作物各按其高產要求的最適宜品種和栽培措施進行種植，但生育期過長，就不能兩熟，或者即使能兩熟，也會使其中一熟產量特別低，結果提高了一熟產量，卻降低了全年總產量。因此，農業科學工作者在總結經驗的時候，對任何一項經驗的增產效果，都不能孤立地來看，而要同其他經驗、同整個生產的總效果聯繫起來，進行全面的總結。只有這樣，才能總結出真正有利於生產的經驗，達到增加總產量的目的。

二、總結農業生產經驗，應該以“生物與其生活於其中的外界環境條件統一”的辯證唯物主義生物學觀點為指導，研究農作物的生物學特性和外界自然環境條件之間的關係。

農作物是有生命的，它的生長發育要求一定的外界環境條件。不同作物，各有一定的生物學特性。不同地區，由於氣候季節變化、地勢、土質等不同，各有一定的自然環境條件。作物豐產，是人們在實踐中對農作



物的生物学特性和外界的自然环境条件的認識达到一定水平的基础上,采取适当的措施,促使它們获得較好的統一的结果。总结农业生产經驗,也就是总结人們所采取的生产措施,哪些是能够促进和为什么会促进这两者达到較好的統一,哪些不利于和为什么不利于这两者的統一。只有这样,才可能正确理解生产措施在增产中所起的作用,因而在运用的时候,做到因地因时制宜。

从总结耕作制度方面的經驗来看:南方一些地区的冬水田、圩田、泡冬田耕作,东北地区的墾作耕作等,都是适应和利用当地的自然条件而形成的向自然作斗争的措施。南方有些地区的群众,在长期向自然作斗争的實踐过程中,找到了适应于当地雨水、气候、丘陵地势等自然条件的耕作制度。他們認識到当地全年雨量大部分集中在六、七、八月,如果不在雨季蓄水保水,春秋季就要受干旱威胁;丘陵地形又很难以人工提水来保证作物对水的需要;同时,如果不以梯田方式拦流蓄水,丘陵地形的土壤冲刷、肥料流失均极严重,必然降低土壤生产力。群众根据对自然条件的这些特点的認識,逐步找到了坡土改梯土,梯土改梯田,蓄水种稻,以适应自然、战胜自然的冬水田耕作制度。这一耕作制度具有抗旱、防涝、抑制病虫、緩冲自然灾害、省工、省肥、高产稳产的优越性。当然,有的地方,由于具备了較好的水利条件,水源方便,劳动力又够用,适当地改冬水田为冬干田,以种綠肥或小春作物,实行水旱輪作,对增产也是有利的。东北地区的群众,根据当地的地势、土质、雨水等自然条件,以及当地緯度高、日照投射角度小影响地温

等特点,找到了适当的耕作制度。他們認識到,在地势平坦的地区,高墾比平作易防夏涝;墾的曲面大于平面,墾作可扩大土壤接受日照面,利用墾的土表曲面角度,可增大日光与墾面的照射角度,更有利于吸收日光热能,使春末夏初地温增高快,有利作物生长等等。从而,逐步形成了具有抗旱保墒、防涝、增温、增产作用的墾作耕作制度。因此,只有对南方的冬水田和东北的墾作所由形成的自然因素进行分析,才能理解这些耕作制度在稳产增产上所起的作用,才能很好地运用和发展这些經驗。

从总结选用良种方面的經驗来看:一个地区有一个地区的地方良种,地方良种是在当地自然条件下,经过长期栽培选育出来的,对当地的自然条件具有高度适应性。种子是生物有机体,它具有要求一定的外界生活条件、并对这些条件产生一定反映的遺傳性。如果良种不能获得其遺傳性所需要的外界生活条件,它的优良特性就不能表现出来,甚至不能抽穗结实;或者所引良种虽能勉强完成其生长发育过程,但生物經濟性状差,产量低,沒有实用价值。这就是說,只有适应一定地区自然条件的相对良种,沒有适应任何地区、任何自然条件的绝对良种。因此,总结选用良种經驗,就应该联系当地自然条件的特点及其与良种遺傳性、适应性的內在关系,指出良种达到丰产所必需的自然条件,如果缺少某些条件,就不可能丰产。对于良种有了这样的認識,才能因地制宜地选用良种,避免不恰当的引种而造成的损失。

再从作物种植适期、不違农时方面来看:地球繞日运轉形成地面季节嬗替,按春夏秋



冬一定不移的顺序出现各季节特定的温度、日照、雨水等综合条件。属于某一季节固有的气候条件，一般只能在該季节出现。气象条件出现的这种顺序性和周期性，就在农作物的历史系统发育中，形成其各生育阶段对外界环境条件的要求与季节气候交替变化一致的遗传性，即作物各生育阶段所分别要求的气象条件，正与按季节顺序出现的温光等自然条件基本一致。这就决定了一切作物品种各有一定的种植适期，各有其最早、最适和最迟的种植时间。只有在作物的最适种植期进行种植，作物才能获得其各个生育阶段按顺序所需要的特定的外界自然条件，产量才能高而稳定。相反地，如果播种时间早于最早种植期或迟于最迟种植期，产量就要减低，甚至无收。

地区不同，纬度不同，地形不同，海拔高度不同，又决定着地区间相同季节的气候差别，因而同一作物品种在不同地区又有各自的种植适期。例如，水稻在海南岛一月播种已能满足其所需要的温光条件，而四川省南部则须三月初播种，四川省西北部更须迟至四月初播种，始能满足其发芽、分蘖、孕穗、开花、结实各生育阶段所需要的温光条件。这就是说，不同地区各有为其具体的气候条件所决定的农事活动适期，不能不顾条件地硬性规定，或者机械搬用其他地区的经验。

在大多数情况下，适期种植还具有避过一定自然灾害的重要作用。如在四川省，小麦适期播种就可以减轻冬涝、春旱和早春低温为害麦穗花器官发育；水稻适期播栽就可以避免烂秧、五月低温影响稻穗发育、七月底迟抽穗遭三化螟为害。由此可见，适时种

植、不违农时，是根据作物的生长发育规律，充分利用自然的有利因素，克服不利因素，争取高产的重要措施。

综上所述，总结农业生产经验，应该密切联系当地的自然条件，找出生产措施与自然条件之间的内在联系，深刻认识增产措施在促进作物的生物学特性与外界自然环境条件的统一方面的作用。这样，才能正确地运用和推广增产经验。

三、总结农业生产经验应该紧密结合当地当时的物质条件和劳动条件，既要总结小面积优越条件下的高产经验，更要重视总结大面积一般条件下的增产经验。

农业生产需要一定的物质条件和劳动条件。一定的物质条件和劳动条件在某种范围内决定着一定的产量水平，并形成与之相适应的农业生产措施和耕作经验。解放以来，由于大力兴修水利，增产化肥和农业机械等，我国的农业生产水平已经有了提高。但是，要根本改变我国农业生产水平的落后状况，达到全面机械化、水利化、高施肥水平等，不是短时间可以实现的。我国耕地广阔而复杂，具有机械化、水利化、土质肥沃和高施肥水平等条件的耕地面积，目前还很少。因此，作为指导当前大面积生产的经验总结，就不应该以小面积优越条件下创造的高产经验为主，而应该从实际出发，以当地大面积的一般条件下获得的增产经验为主。如果把特殊条件下小面积上取得的高产经验，运用于一般条件下的大面积生产，不仅不能达到增产的目的，相反地还可能造成减产。例如粳稻在肥料充足的条件下一般比籼稻耐肥、抗倒伏、产量高，在小部分肥力较高的稻田实行



种稻改粳稻是增产措施，但是，如果不考虑粳稻需肥多的特点，不分地区土质、肥料条件，全面改种粳稻，尽管小面积可能增产，大面积却势必减产。同样，在条件具备的地方，单季稻改双季稻是一项增产措施，但是，改种的面积究竟占多少，应该根据当地的气候、人力、物力条件来决定，这样，才能收到应有的增产效果。

这并不是说，在目前大面积耕地的物质条件比较差的情况下，大面积的产量就不可能提高。前面所说的一定物质条件在某种范围内决定着一定产量水平，是指运用一定物质条件下的成功经验达到所能达到的最高产量以后，要使产量继续提高，有赖于增加新的物质条件。当前生产的物质条件虽然比较差，但是，是否大面积耕地已全面发挥了这种条件下的增产潜力，达到了应有的最高产量水平呢？可以肯定地说还没有。有的农业劳动模范说：“同样的土，同样的水、肥，各人的做法不同，庄稼收成好坏大不同。”这也正如四川省有句俗话所说的：“膏药一种，各人熬炼不同。”物质条件只是决定产量的因素之一，在同样的物质条件下，采用不同的耕作技术和种植方法，产量会有很大差别。例如有些经验特别丰富的农民，他们的许多增产经验，并不是靠特殊优越的物质条件获得的，而是在现有的一般物质条件下，由于采用较好的耕作技术和种植方法所取得的，他们取得的增产成就远高于同他们条件相同的其他农民。有的农业劳动模范说：水稻增产有穷办法和富办法。根据目前大面积耕地的物质条件，需要着重总结他们的穷办法。如果全国各个地区的大面积产量，都从当地

现有水平提高到当地劳动模范用穷办法取得的先进水平，那末全国农业产量将会有很大的提高。

强调总结大面积一般物质条件下取得的增产经验，并不是说，就可以忽视总结小面积特殊条件下取得的高产经验。应该看到，各个地区或多或少都有一部分土质肥沃和水、肥条件优越的耕地，这类耕地面积虽然不大，但在提高单位面积产量方面潜力较大，充分发挥这类耕地的增产潜力，对于提高总产量具有重要意义。目前大面积耕地的生产条件虽然比较差，但毕竟是暂时的。在我国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下，随着工业不断为农业提供更多的物质条件，随着农业本身的发展，同比较优越的物质条件相适应的能够达到更高产量水平的农业技术措施，将不断扩大其应用范围和作用。因此，对于特殊条件下的高产经验，也不应该忽视。

四、总结农业生产经验应该是继承与发展相结合，在继承的基础上总结出进一步发展生产的方向和途径。

农业生产是向自然索取物质财富的复杂斗争。要征服自然、利用自然，就必须认识自然、熟悉自然，就必须继承祖先世代积累下来的向自然作斗争的经验。自然的变化规律复杂，周期时间长。自然条件，不仅在不同地区间存在着千差万别，而且同一地区在不同年度间也存在着多样性的变化。要掌握年度间气候变化规律，认识生物在不同年度气候条件下的不同反映，单靠直接经验是远远不够的。某些有利的或不利的的气候因素，不是年年都出现，而是有一定的周期性，要几年或十几年才出现一次。气候变化方向要



更長時期才能看出。某些特大自然災害要幾十年甚至更長的時間才出現一次，一個人的畢生閱歷有限，很可能一次都遇不上。例如，四川省在六十年前發生過一次大旱，當時群眾在抗旱中採取的一些有效的應變措施，只有八十歲左右的老農才有閱歷經驗。我們曾經拜訪過四川省瀘縣石洞區的一位八十歲的老農徐華山，他就詳盡介紹了那次天旱的情況及當時抗災遲種早稻的種種成功經驗。又如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這樣連續三年的特大自然災害，是近百年來少有的，人們對災害會連續發生的可能性沒有足夠的認識，有的生產隊在遭遇一年災害之後，抱着災害不會連續出現的僥倖思想，而忽略了第二年、第三年繼續防災抗災的準備和措施。但也有的生產隊在第三年連續發生旱災的情況下，取得等雨遲栽的保產經驗。如四川省瀘州新民公社新民大隊第六生產隊，一九六一年全隊八十六點八四畝稻田僅有三畝有水栽了中稻，其餘均無水。有的主張仍改種紅苕，但經過全隊討論，還是決定等雨栽種水稻。根據是：（一）栽水稻比種紅苕省工、省肥、產量高，如果繼續改種紅苕，以後雨水來了又不能關水，一九六二年將仍不能恢復水稻生產；（二）任何大旱年份也不會一年干到底，六、七月總有雨；（三）往年種雙季晚稻大暑遲栽，也收過四百多斤；（四）南特號品種生育期短，遲栽也不會在抽穗時遇低溫為害。他們這樣決定，是做對了，七月初果然降了大雨，栽上了四十二點三畝水稻，共收稻穀一萬七千三百四十斤，獲得平均每畝四百零九點九斤的較高產量。一九六一年這些田也就關上了水，恢復了冬水田耕作制，取得一

九六二年的生產主動權。類似這樣的抗災保產經驗，應該很好地總結和繼承。

繼承歷史經驗的重要性和必要性，還在於它是經受了相當長時期的自然的嚴峻考驗，並在長期實踐過程中，通過廣大勞動人民的不斷檢驗修正而充實起來的，它是億萬勞動人民若干世代的集體智慧的結晶。繼承群眾的生產經驗，是認識自然戰勝自然的捷徑，是進一步提高農業科學水平以發展生產的不可缺少的條件。

繼承群眾已有的經驗，是總結農業生產經驗很重要的一方面，甚至可以說是主要的一方面。另一方面，也應該看到群眾經驗有其歷史局限性。在總結經驗的時候，也要善於發現其中的缺點或不够完善的地方，研究出在現有條件下進一步改進的辦法，並儘可能預見到客觀條件的發展變化，指出今後具備某些新的條件後，實現更高生產水平所應採取的相應措施。這樣要求是完全必要和可能的。因為現代農業科學各個領域取得的巨大成就，為群眾生產經驗的不斷發展，創造了和繼續創造着新的條件。例如，選種方面，不斷選育出具有更好地利用自然因素的遺傳性的新品種；氣象工作方面，對大自然氣象因素循環規律和各個地區的小氣候規律有了更深入的研究，能夠作出準確性很高的氣象預報；植物生理研究工作，不僅從作物的營養生理和發育生理方面探索生物規律有了比前人更多的認識，最近更提出群體概念；進一步研究作物豐產的群體生理；土壤肥料工作，從過去如何因地施肥獲得一季一年高產的研究，提高到用地與養地結合，以保證土壤肥力不斷上升、作物長期持續高產



的研究，并取得了許多新成果；植物保护工作方面，研究出不少有效的积极防治病虫害的办法。另外，随着人民公社的巩固和健全，工业支援农业工作的加强，农业生产的物质条件将会不断改善，随之，农业技术措施也应该有相应的发展。由于上述原因，完整的經驗总结必須包含继承和发展两个方面。这样的經驗总结，才能对生产起更大的指导和促进作用。需要注意的是，在总结經驗中提出的一切推論和新的措施，都必须經過試驗证明确实有效以后，再运用于大面积生产。

五、总结农业生产經驗，既要总结成功的正面經驗，又要总结失败的反面經驗。

成功的經驗固然可贵，失败的經驗是付出了一定代价换来的，尤应珍惜。有时候，只有成功的經驗，沒有失败經驗的对比印证，很难证实成功經驗的正确程度。例如，各种作物如果没有不同种植期的对比，不經過許多不适宜种植期的生产結果的印证，就不能确切地知道什么時間是最适宜的种植期。又例如，在深耕的問題上，如果不經過許多不同深度的效果的对比，也就不能印证哪种深度是最成功的深度。其他如施肥、密植等也是如此。

我們說，有时候成功經驗的正确程度需要反面的失败的經驗来印证，并不是說，可以随意以大面积生产来作各种对比試驗。同样一种經驗教訓，既可以在大面积生产中取得，也可以在小面积試驗地上取得。失败的經驗，如果从大面积生产中取得，要付出巨大的损失作代价；但是，从小面积試驗地上取得，則只需要付出較小的研究代价。我們所以強調一切要經過試驗，目的也就是在获得各种宝贵的經驗教訓的过程中，只付出較

小的代价，避免造成大的損失。

当然，無論是大面积生产或小面积試驗，都应该尽量避免失败而造成損失。在进行各种試驗，特别是将試驗的成果推广到大面积生产的时候，要采取十分慎重的态度。但是，由于农业生产受着大自然的强烈影响，生产条件的可变因素較多，同时，农业工作者的經驗和技术水平也不一致，因此，有时候发生某些失败的事故，也是难免的。发生了失败的事故，造成某些損失，当然是坏事；但是，只要认真地总结經驗教訓，找到失败的原因，这种坏事就能够变成好事，代价就不会是白白地付出。因此，在总结农业生产經驗的时候，不能只看成功的經驗，而是既要总结成功的經驗又要总结失败的教訓。应该看到，总结成功的正面經驗，对指导生产有现实意义；总结失败的教訓，对于更深刻地認識正面經驗，对于避免以后再遭同样性质的失败，对于促进农业增产，同样具有重大意义。

总结农业生产經驗，是摆在我們面前的一项长期的艰巨的任务。这需要广泛地收集現阶段农业生产中的各种事实材料和大量的历史資料。詳細地有了資料，还要以辯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和現代的农业科学理論为指导，做科学的分析研究，才有可能加深和丰富我們对农业生产的內部联系和規律性的認識。已經总结出来的經驗，也还需要在實踐中反复加以驗證。做好这一工作，需要农业科学工作者和广大农村干部共同作长期的努力，虛心学习农业科学知识，认真地走群众路綫，特别是要认真听取有丰富的生产經驗的老农的意見。



語言學習雜感

· 曹 禺 ·

什么样的人會說出什么样的話。人不能脫離了自己的階級、生活、思想、感情與語言的教養，抽象地、超然地說出一套話來。語言是人用來表達思想感情的工具，也是人的鏡子，有革命感情的人，才能說出感人的革命語言。

羅學瓚烈士(1893—1930)在湖南第一師範讀書的時候，便寫了這樣的語言：

不患不能柔，惟患不能剛；
惟剛斯不惧，惟剛斯有為。
將肩挑日月，天地等塵埃。
何言乎富貴，赤胆為將來。

這是多么激勵志氣的詩句！它說明一個真誠的革命戰士的肺腑語言只有這樣，不會是別的。

明末清初有一個錢謙益，一生醉心功名利祿，奴顏婢骨，老而不知耻。連後來的新朝統治者乾隆都罵他：“大節有虧，實不足齒於人類”。他晚年受盡奚落。在八十歲的時候，回顧腐朽的一生，老境淒涼，他不禁流露心裏的話：“……榮進敗名，艱危苟免，無一事可及生人，無一言可書冊府，瀕死不死，偷生得生。”看看自己，想

想轰轰烈烈，一代完人的師友，他在詩里也只好這樣懺悔：“故鬼視今真恨晚，余生較死不爭多”。錢謙益是個文人，他是懂得用文字來裝飾自己的，但是在嚴肅的歷史面前，他不可能用語言來打扮自己。他的詩文告訴我們，他不過是一個齒落骨枯，連乞憐的尾巴都搖不動的老狗而已。

再讀一下楊匏安烈士(1896—1931)的獄中詩：

慷慨登車去，臨難節獨全。
余生無足戀，大敵正當前。
投止窮張儉，退行笑褚淵。
者番成永別，相視莫潸然。

哪種語言充滿了天地間的正氣，那種語言才是真正的人的語言，這是用不着說的了。

“言為心聲”，又說“情見乎詞”，沒有感人的思想內容，就不會有感人的語言。所以古來有人直截了當地說，詩是人的情性。一個學習語言的人若不首先認為好的、美的、真實的語言是從自己的好的、美的、真實的生活與思想來的，相反，以為只是關在屋裏雕琢文章，苦下功夫就可以把語



言炼好，这是妄想。

什么样的人，就有什么样的语言。要把语言写好，使人信服，首先就要老实；老实的语言便是“心声”，“心声”是骗不得人的。

学习掌握语言，我知道要下艰苦的功夫。后来，感到仅下功夫还不够，要学习前人的经验，懂得一些窍门和方法。近来，又觉得这些还是不够，逐渐明白，要学好语言，首先要对语言发生强烈的兴趣。不能以为自己是个作者，应该意新语工，高人一等，才要学一套造词造句的本领。如果我不爱语言，不感到文学语言的魅惑力量，不能沉醉在丰富深刻的人民语言的奇妙世界里，那便是“缘木求鱼”，空有一个决心，是学不好如何使用语言的奥妙的。要爱语言，要着迷，语言的妙境才能领会得到；之后，才能谈到学着掌握语言，学着使笔下生花，创造同样真实、生动、迷人的语言境界。

为什么我们读到一篇好文字，往往要流连反复，一唱三叹，要背诵，要传抄，要找个好朋友同声欣赏？这不只是因为文章的思想感情吸引我们，还因为这思想感情表达得那样感人，那样恰当，那样传神，使我们不由得发生强烈的兴趣。这强烈的兴趣是学习语言的重要条件。

我们学习语言是为了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在学习语言的过程中，作者的革命责任感和这种对语言的兴趣是同样重要

的，两者都是推动我们学习语言的力量。我们知道语言是武器，学好了，可以帮助我们改造世界，因此，要苦学苦练，却不常记得，语言本身是十分迷人的艺术，爱上它，就丢不下的这个事实。对语言的兴趣，并不是每个有志于学习语言的人都有的。苦学可以使人发生兴趣，但往往有人不知，有了强烈的兴趣，才更容易领略语言的妙境，才更能摸索语言的精微。人的头脑在未学习之前是闭塞的。苦学可以使人“通”，但得到学习之乐，就更容易使人“通”。然而也有人苦学一生，还是看不出他对语言发生什么真正的兴趣。他很辛苦，但他总像是徘徊在语言艺术的门外。为什么会这样呢？可能因为他的兴趣与才能另有所在，但也很有可能因为他没有体验到学习语言之乐，没有打开这个乐园之门。

幼年读《三字经》，塾师说：“‘头悬梁，锥刺股’，古人就是那样读书的。”听了，我便怕读书。如今我只看出其中有一种刻苦发愤的道理，还是不喜欢那一幅森然可畏的受难的图画。我是不赞成皱着眉头，口含黄莲那样地读书、写文章的。写文章、读书自然不能轻而易举，要付出艰巨的劳动，但这并不是说，这就不是乐事。我赞成用心读书，勤奋学习语言，但我还是十分欣赏陶渊明读书时“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的态度，这是懂得读书的真味道的人的精神状态。

写文、写诗、写剧本，锻炼语言的乐



趣又何尝不是这样呢？为了一句话，一个字用得精确，用得传神，用上一夜一夜的功夫，千挑万选，塗抹滿紙，而終夜不成，这难道不苦嗎？然而回头一想，如果其中没有乐趣，望着眼前的語言难题，如对枯柴败木，不发生一絲真正的兴趣，誰又能长此投进这样多的苦功夫呢？学习語言总得要苦练才成，有人談起吟詩之苦說：“……句句夜深得，心自天外归。吟成五字句，用破一生心。……”一句五言詩，要用破一生心，可謂真苦了；然而乐也在其中。

没有对語言創造发生极浓烈的兴趣，一个作者便难成其为作者。辛辛苦苦，琢磨語言，同时又兴味无穷，感到語言創造的快乐，这就是作者一生的工作。寻觅那“唯一的、完美的一句话”，用阿·托尔斯泰的話說，要找寻那“金剛石似的語言”，这就要有如饥如渴的愿望和兴趣。

我們不是为兴趣而写作的。我們写詩歌，写小說，写剧本，是为革命，为人民的利益。因为馬克思列宁主义者总是主張以“文”来載馬克思列宁主义之“道”的。語言是手段，不是目的。但正因为我們写作怀着这样崇高的目的，我們就更要把語言这个手段练得更有力，更高明。我們有这样一個強烈的愿望。

然而这里，兴趣还是发生作用的。对語言研究发生兴趣，懂得語言研究的真味道，語言的进步便如水之就下那样順当，反之，只有鍛炼語言的愿望而无兴趣，語

言的进步就如激水上山那样的困难。古来有一句話：“以道为飲，以文为食。”过去許多大文章家廢寢忘餐，在語言、文章中看見了深厚的乐趣，都有一种欲罢不能的情感。比如讀韓愈、柳宗元的文章，不但使我們感到作者对于自己的时代的強烈責任感，而且如果用心誦讀起来，也会使我們感到这些大文章家对于語言的深切喜愛。

我們有些初学語言的人不免还有这样的情况：有真誠的決心要提高語言的修养，却对語言不愛好，或者不十分愛好，或者仅仅是口头上的“愛好”。然而热爱語言，肯定是会幫助我們掌握語言的。“文章千古事”，作詩，在杜甫看，是不朽的事业。他說“为人性僻耽佳句，語不驚人死不休”。他是如何重視創作，又如何热爱語言啊！

兴趣不是生来就有的，生活与劳动会使我們对某些活动发生兴趣。一辈子种菜蔬的农民就会对种菜蔬发生兴趣。要培养对語言的兴趣就要不断接触語言。工、农、兵群众的語言，各階級的活生生的語言，古今中外的文学語言，如果认真学习，都可以提高我們对語言的兴趣。熟讀好文章，好剧本，好詩，背誦它，揣摩它，一边讀，一边想作者的用心处，一遍两遍，乃至无数遍地熟讀，久而久之，便心領神会，理解了它的好处，那才会发生真正的兴趣。杜甫竭力称赞他的一个朋友說：“群书万卷常暗誦”，他自己又何尝不如是呢。馬雅可夫斯基对古今大詩人的作品也是成



本成本地背誦的。这样认真地研究語言，才能理解語言，对語言有兴趣。

对文学的語言既然应该发生兴趣，对实际生活中間的、无限丰富的人民的語言，就更应该发生兴趣了。对于生活中間的語言要下深厚的基本功夫，我是主張用笔記錄的。少数一直在生活中打滾，生活經驗极其丰富，记忆力又好的人，他們也許可以不記，但他們还是需要研究語言，要培养对語言的敏感。至于我們呢，便需要記。当着人記也好，后来追記也好。要对人民的語言，生活的語言发生強烈的兴趣，揣摩它，寻味它，看它妙在什么地方，什么地方使人感到它真实，准确，生动，傳神，美，有思想，有味道。这种笔记不是毫无选择的記錄，应该看得出記錄者的目的和修养。（比如，不是要我們記下所有的諺語、歇后語、俏皮話等等。）一个人真要記下一箱子一箱子的人民生活中的語言、人物和故事，而且小本上的每一句話都是用了心思才記下的，反复看过，想过，不是記完了便擱在脑后，埋在箱子里，从此不見面了，那他才逐渐体会語言的妙处，对語言发生兴趣了。

一天我們对于語言“着了魔”，那才算是进了大門，以后才有可能登堂入室，从事語言的創造。由有兴趣学习語言，到能称心如意运用語言，使它成为艺术品，这又是进了一大步，要費更大的苦功夫。作者对語言应如魚之于水，人之于空气，有一

种离不开的感觉才成。离开了語言，作者就仿佛失了魂，丧了魄，这样才是真正的喜爱。革命的語言艺术家視語言如戈如矛，如枪如劍，就更应该喜爱他的武器。

我最近和一位語言艺术的前輩一同旅行，几乎日夜在一处，我看他兴致勃勃，白日作詩，晚間写文，有空便讀新的旧的文章，爱和各种人物长談。他喜欢孩子，甚至在长途汽車上他也对孩子讲說自己即兴編的妙不可言的童話。他很忙，他几乎沉浸在終日不停的語言創造里，或者如他平日謙虛地說的“語言练习”里，他兴味盎然，沒有一絲疲倦的神色。他一点不使我联想到那些“头悬梁，錐刺股”的人們，然而他一天的劳动是何等惊人，他写出的作品是何等有魅力啊！我又想起七十六岁的盖叫天老先生，他热爱表演艺术，他一开口，一抬手，便是最美、最好的戏的語言和动作，見了朋友，便滔滔不絕，談起林冲、武松这些人物的塑造，仿佛这便是他最好的休息。他开玩笑說，自己是“戏迷”。我看，“迷”真是极好的事情。为什么我們不多出一些“語言迷”呢？

学习語言是要有些方法，有些窍門的。知道了这些，可以事半功倍，可以比較順当地升堂入室；然而很少有人把兴趣当作一个窍門看。学习語言这些年，我才明白，还是要培养自己对語言的兴趣，把假兴趣变成真兴趣，把肤淺的兴趣变成深刻的兴趣，这才是一个极大的窍門。对語言的兴



趣、喜爱，这是源头活水，可以取不尽，用不完。有了它，我们再讲究学习语言的方法，语言便易为己用了。

对怎样一种语言应该有兴趣呢？语言是有美丑、高卑、精粗的区别的。我们要有兴趣研究一切美的、高的、精的语言，要分辨得出那丑的、粗的、卑下的语言。

有这样一种观念：仿佛我们对美的高的精的语言必然一见生情，天生就会喜爱的。以我看，这不尽然。我小时候不能领会屈原、杜甫的诗。长大一些，懂得他们一些词句的意义了，仍然不算喜欢。直到后来，看见人民的丧乱流离，重重苦难，才开始喜欢，但对他们语言的精微还是说不上能领略的。我有一个小时候的朋友，看了一辈子《济公传》，却始终不爱看《红楼梦》和《水浒》。对美的语言不是生来就有兴趣，就有认识能力的。对于美的语言有兴趣，就是对美的语言有理解、欣赏的能力。这是需要用功培养，才能得到的。

一个学习语言的人，总应该锻炼自己对语言的敏锐的感觉。语言在他面前，哪一个字是准确的，美的，哪一个字是不准确的，使他“反胃口”的，他应该感觉得到。他应该这样灵敏，甚至于不用什么理由，凭直感便能断定他的选择就是精确的。一个语言的艺术家用选择每一个字，都有用心，有理由。我们学习语言，就是要寻觅，体会，找到“语”与“意”之间的最精微的关系，探索语言艺术家们以及人民生

活里最美、最好的语言，是如何用最恰当的言辞，表达难以表达的思想 and 感情的。苏东坡说：“求物之妙”，是很难的，使“物之妙”了然于心，千万人中难遇见一个；用口说出来，用笔写下来这“物之妙”，就更难了。更早谈文章的人说，要“意能称物，辞能逮意”。复杂微妙的“意”，常常不能一下子用语言捕捉得到的。因此，一个学习语言的人，要不断磨砺他对语言的敏锐的感觉，才能够使他比较完美地传达心中的“意”，眼中的“物”，才能使他已经了然于心的“意”或“物”，不至于为拙劣或浮华的言辞所累。对语言的敏锐感觉是无止境的，因此要不断磨砺，这是一个语言艺术家一生的事情。

为什么我们过去那样厌恶“鸳鸯蝴蝶派”的东西呢？这不只是因为它的思想感情不能使人接受，那种陈词滥调，虚有其表的感伤辞句，就使人经受不起。不是所有的人都能看得出屈原、杜甫、鲁迅和一切伟大文学家的语言的美的，首先要能够对好的，美的，真实的语言看得出，体会得到。常常一个字的妙处，便看得出作者语言的感觉如何。能否看得出那一个字的妙处，也衡量了我们自己语言的感觉如何。有一旧本杜甫集，文多脱落。在《送蔡希鲁都尉》诗中，有一句“身轻一鸟×”，写一个志雄气猛的武将，驰马战斗，说他轻得像一只鸟那样“×”。“×”字脱落，有些文人便揣测，原来是什么字。有



說“疾”(即“身輕一鳥疾”)；有說“落”；有說“起”；有說“下”；却都感觉不怎样恰当。后来，得到一个善本，才知道是“身輕一鳥过”。大家叹服了。“过”字为什么比“疾”、“落”、“起”、“下”都好呢？用“疾”字，露了；用“下”字，拙了；用“起”，用“落”，似乎仅限于鳥的状态，有些“执”了；都病在着痕迹，不自然，不贴切。恰是用了一个“过”字，“身輕一鳥过”，叫人想起碧空晴日，一鳥瞥然掠过，那样地輕灵活潑，道出枪急将勇，馳馬追敌，一閃而去的感觉。这样一句“身輕一鳥过”，才呼应得起下面的一句“枪急万人呼”。只有伟大的詩人才有这样极其敏銳的語言感觉。

这样的敏銳的語言感觉，是詩人多少年来对好的、美的、真实的語言发生了強烈的兴趣、“苦用心”的結果，是必須做到“毫发无遺憾”的“苦吟”的結果。尽管杜甫說他“下笔若有神”，但那还是从苦学、苦思、不断鍛炼中取得的敏銳感觉，才使他有这种称心如意的創作境界。必須要从苦学中寻找引起人創作欲望的乐趣。不是愈苦学，創作之火愈暗了。要对美的、好的、真实的語言有兴趣，这才进了学习語言的大門。进一步，鍛炼、培养自己对好的、美的、真实的語言的敏銳感觉，这才进入了用語言来創作的大門。

說回头，語言是一种从屬的东西，語言总是以“意”为主的，而“意”便是为一个人的思想、感情、階級立場所决定的。古人

說，要有“怀霜之心”、“临云之志”，也就是怀抱高洁心情的人才写得出好文章，便是这个意思。什么人，就写出什么話。要文章写得好，就要求修辞立誠，表里如一。写文章要辞意双美，不能重辞輕情，更不能有辞无情。好的民歌是朴素的、自然的，它应感而来，思若風发，言若泉流，却总是充滿了深厚的思想，不可抑止的感情。伟大的革命詩詞便是这样。苦学苦练才能提高語言艺术，这是真理。但另一个真理是，伟大的語言总是从伟大的心灵中来的。讀下面張錦輝烈士(1915—1930)的就义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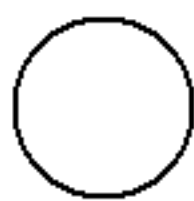
唔(不)怕死来唔怕生，天大事情
妹敢当；

一心革命为穷人，阿妹敢去上刀山。

打起紅旗呼呼响，工农紅軍有力量；
共产党万年走天下，反动派总是不
久长。

穷苦工农并士兵，希望大家要齐心；
打倒軍閥国民党，何愁天下唔太平。

这是一个十五岁的姑娘就义时写的。这里，燃燒着火热的革命时代，火热的革命心胸。明若日月的道理，風雷震怒的精神，短短几句心里話，它激动过去、今天和将来的战士，要我們警惕，催我們向前，战斗、再战斗。这是不朽的声音，不朽的語言。



談談共產黨員的義務和權利

蘇 沛 劉家澤

中國共產黨的一千七百多萬黨員，分布在全國各地和各種崗位上，有許多黨員還擔任了一定的領導工作。他們同人民群眾有着密切的聯繫，和人民群眾一起，擔負着建設社會主義的偉大任務。執政黨的地位和建設社會主義的任務，向每一個共產黨員提出了嚴格的要求。人民群眾對於我們黨的信任，也督促每一個共產黨員必須嚴格地要求自己，更好地為人民服務。

在我們黨的章程中，規定了黨員的義務和權利。黨章關於黨員義務的十項規定，是黨對於我們每一個黨員的基本要求，是每一個黨員對黨應盡的責任。黨章關於黨員權利的七項規定，是提高黨員的積極性，發揮黨員的創造性，活躍黨內的民主生活，保證黨內生活正常發展的必要條件。劉少奇同志在黨的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關於修改黨章的報告和鄧小平同志在黨的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上關於修改黨的章程的報告中，對黨章規定黨員的義務和權利的意義，以及黨員如何履行義務和行使權利，作了全面的深刻的論述。這裡僅就若干方面來談談我們學習中的體會。

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是黨章規定的黨

員義務和權利的根本出發點。毛澤東同志說：“我們這個隊伍完全是為着解放人民的，是徹底地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①這就是說，為黨工作就是為人民服務。作為人民的勤務員，共產黨員對人民只有忠心耿耿、努力工作的義務，沒有任何特殊的權利。黨章規定的黨員權利，是黨給予黨員在黨內行使的民主權利。黨員行使這些權利，是為了更好地履行義務，更好地為人民服務。

關於黨員的義務，黨章首先規定，黨員必須“努力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不斷提高自己的覺悟程度”。

共產黨員的覺悟，表現在認識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確信共產主義事業必將勝利，並且用堅強的決心和毅力，奮不顧身地為實現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事業而鬥爭；表現在能夠堅定地站在無產階級的立場，用正確的观点和方法分析問題、處理問題；表現在對於黨和人民所委託的工作具有高度的責任心，不怕困難，不辭勞苦，不嫌麻煩，盡力地做好工作。共產黨員的這種覺悟，是怎樣產生和怎樣提高的呢？親身參加革命和建設

^① 《為人民服務》。《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2版，第1003頁。



的实践斗争是不可缺少的重要方法。中国从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的长期复杂的阶级斗争是一个巨大的熔炉，从这个熔炉中锻炼出来了許多共产党员。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也同样是锻炼共产党员的熔炉。如果脱离了群众，脱离了实际斗争，提高无产阶级的觉悟就只是空谈。但是，只靠实际斗争，也还不能保证觉悟程度的不断提高。从斗争实践中取得的经验，需要提高和系统化，这就必须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指导。而且无产阶级觉悟程度提高的过程，同时就是不断地克服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的过程；人们有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武器，才能真正识别一切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有效地加以克服。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相结合的结合品，每一个共产党员必须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同志的著作，武装自己的头脑，才能成为具有高度觉悟的无产阶级先锋战士。

理论联系实际，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唯一正确的原则。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为了确立正确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解决革命和建设实践中的问题；是为了正确地、系统地总结实践斗争中的经验，把经过实践检验的经验上升到理论高度，再用以指导实践。只有采用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才可能真正懂得党制定路线、方针、政策的理论根据和实践根据，因而也才可能坚决地、正确地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

党章把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规定为党员的义务，具有深刻的意义。一个党员越是认真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不断地提高自己的觉悟程度，就越能做好工作，越能更好地完成党和人民交给他的任务。相反，一个党员如果缺乏必要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修养，在政治上不能辨别大是大非，不能正确地理解和执行党的政策，不懂得正确的工作方法，就很难设想能够把工作做好。对于共产党员来说，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不是私人事务，而是对党和人民应尽的一项义务。有的同志认为“学习是无关紧要的事情，不学习也可以工作”，这是错误的。一个共产党员如果对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抱这种态度，就很难期望他在工作中正确地发挥积极性和创造性，也很难期望他在工作中避免盲目性。有的同志强调“工作忙，没有时间学习”，这也是不对的。事实证明，只要工作方法对头，善于安排工作，总是可以挤出时间来学习的，关键还是在于提高学习的自觉性。

党章规定，党员必须“维护党的团结，巩固党的统一”，必须“认真地执行党的政策和决议，积极地完成党分配给自己的任务”，必须“严格地遵守党章和国家的法律，遵守共产主义道德，一切党员不管他们的功劳和职位如何，都没有例外”。党章关于党员义务的这几项规定，要求每一个党员必须自觉地遵守党的纪律和国家的法律，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来加强党的团结，增强党的战斗力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

党的团结是党的生命。党员维护党的团



結，巩固党的統一，是自觉地遵守党的紀律的表現。毛澤东同志曾經把党的紀律概括为如下四条：个人服从組織，少数服从多数，下級服从上級，全党服从中央。他說：“誰破坏了这些紀律，誰就破坏了党的統一。”^① 全党服从中央是四条紀律中最核心的一条。我們党之所以具有强大的战斗力，正是由于全党在以毛澤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下，統一行動，使全党成为一个由无产階級的铁的紀律联結起来的統一的战斗組織。所有的黨員都必須在党中央的統一领导下，加强紀律性，維護和巩固党的团結和統一，才能团結广大群众，去战胜敌人，克服困难，取得建設社会主义的胜利。

党的政策是党中央和毛澤东同志根据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結合我国实际情况制定出来的。它集中地代表了广大人民的利益，正确地反映了国家、集体和个人之間的关系。当党的领导机关对某一项政策还没有做出决定以前，每个黨員都有权利在党的會議上或者党的报刊上，自由地、切实地参加討論，发表自己的意見；每个黨員也应该以对党对人民負責的精神，积极提供意見，帮助党做出正确的决定。但是，当党的领导机关对某一项政策做出决定以后，每个黨員就必须无条件地执行。黨員无权修改党的政策，不允許借口“情况特殊”，不执行党的政策，或者采取和党的政策相抵触的行動。如果对党的政策还有意見，应该一方面坚决执行，一方面按照組織原則，积极向上級反映自己的意見，听候上級解决，不能因为个人对党的

政策有不同的意見就不去执行。

党章規定了党的最基本的政治綱領和党的最根本的組織原則，規定了黨員的義務和权利，規定了党的組織机构和組織制度等。它是党的法規，是党的生活的准則。一切黨員，不論他党齡长短、功劳大小和职位高低，都必须毫无例外地遵守党章。一切違反党章的行動都是党性不純的表現。严重違反党章的行動，应该受到党的紀律处分。

共產黨員遵守国家法律和遵守党的紀律在根本上是一致的。每一个黨員既要具有严格遵守党的紀律的观念，又要具有恪守国家法律的观念。无产階級取得革命胜利以后，为了建立和巩固无产階級专政，必須摧毀反动統治階級的法統，建立起革命的法制，用以巩固革命秩序和革命成果。国家法律体现了无产階級和广大人民的意志，也体现了党的意志。共產黨員維護国家法律，也就是維護革命秩序和保卫革命果实。革命者在反动統治时期，向反动法統进行斗争，是革命精神的表現；在革命胜利以后，遵守国家法律，維護革命法制，同样是革命精神的表現。每一个黨員必須了解，任何黨員，对于国家來說，只是一个公民，只有严格遵守国家法律的义务，而沒有任何权利違反国家法律。

共產黨員必須遵守共产主义道德。共产主义道德是社会主义社会中人們行動的共同

^① 《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毛澤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516頁。



的规范和准则。共产党员作为国家的公民，自然应该以身作则地遵守这种规范和准则，在人民群众中起模范作用。列宁说：“共产主义者的全部道德就在于这种团结一致的纪律和反对剥削者的自觉的群众斗争。”^①“为巩固和完成共产主义事业而斗争，这就是共产主义道德的基础。”^②在这里列宁揭示了共产主义道德的最本质的内容。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反对剥削者的自觉斗争和巩固、加强社会主义建设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我们不仅要同旧社会的剥削者破坏社会主义事业的行为进行坚决的斗争，而且要同一切损害社会主义事业的行为进行坚决的斗争。贪污、盗窃、浪费国家财产、破坏公共财物、损害集体经济利益的行为，不管它是否达到违法的程度，都是剥削阶级的思想意识的反映，都是违反共产主义道德的行为。共产党员有责任不倦地在人民群众中宣传共产主义道德，并且和人民群众一起，造成维护社会主义事业的强大的舆论力量，来抵制各种损公利己的行为。

党章规定，每一个党员都必须“把党的、国家的、也就是人民群众的利益，摆在个人的利益之上；在两种利益发生抵触的时候，坚决地服从党的、国家的、也就是人民群众的利益”。一个党员是否认真履行这一项义务，是判断他的觉悟程度的重要标志。我们党是一个大公无私的、一切从人民利益出发的无产阶级政党，“除了人民的利益之外，党再无自己的特殊利益。”^③这就是说，党的利益就是人民的利益。每一个共产党员从入党的第

一天起，就必须认定，他不是自己个人利益的代表者，而是党和人民利益的代表者，他应该全心全意为党工作，为人民服务，毫无利己之心。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一个共产党员，应该是襟怀坦白，忠实，积极，以革命利益为第一生命，以个人利益服从革命利益；无论何时何地，坚持正确的原则，同一切不正确的思想和行为作不疲倦的斗争，用以巩固党的集体生活，巩固党和群众的联系；关心党和群众比关心个人为重，关心他人比关心自己为重。这样才算得一个共产党员。”^④

几十年来，我们党的绝大多数党员都是按照党和毛泽东同志的要求做的。在革命斗争中，他们不计名利，不图享受，不怕坐牢，不怕杀头，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贡献出自己的全部力量。共产党员的这种自我牺牲的精神，获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信心和热爱。每一个共产党员，都应该十分珍视人民群众的信心和热爱，在革命胜利以后，继续保持这种崇高的品质，谦虚谨慎地为党和人民工作。如果一个党员，在革命胜利以后，骄傲自满起来，把自己在工作中取得的成绩，看作是个人的功劳；把人民群众对党的信心和热爱，看作是自己向党 and 人民索取名利的凭借，他就丧失了共产党员的优秀品质，也就

①② 《青年团的任务》。《列宁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第281、282页。

③ 刘少奇《论党》，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第46页。

④ 《反对自由主义》。《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349页。



不可能继续取得人民群众对他的信任。

有人认为，在革命战争中，共产党员牺牲个人利益、甚至牺牲生命去服从党和人民的利益，这是必要的。在和平建设时期，未必还需要这样做。这种看法是不正确的。我们要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强国，必然要经过一个长期曲折的、艰苦复杂的斗争过程。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艰苦的劳动，克服巨大的困难；企图不付代价，不作牺牲，就取得胜利，显然是不可能的。在建设的过程中，整体利益和局部利益、长远利益和眼前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仍然可能发生矛盾。共产党员必须在工作中正确地处理这些矛盾，根据党和国家的需要，自己带头并且说服群众，使局部利益服从整体利益，眼前利益服从长远利益，个人利益服从国家利益。共产党员必须识大局，顾大体，继续发扬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在工作中精打细算，节省国家资财，在生活上艰苦朴素，和群众同甘共苦，以自己的模范行为来带动群众。在革命烈火中，一个共产党员为革命事业贡献出自己的生命，或者离开家庭走上前线，忍受艰苦毫无怨言，人们容易理解，这是一种牺牲个人利益、服从党和人民利益的优秀品质的表现。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在和平的环境中，一个共产党员首先考虑如何加强社会主义建设，如何逐步地改善人民的生活，埋头苦干，公而忘私，吃苦在前，享受在后，从不斤斤计较个人的名誉、地位和待

遇，在党和国家需要的时候，勇于牺牲个人的利益，这同样是共产党员必须具备的优秀品质。

党章规定，共产党员必须“全心全意为人民群众服务，密切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向人民群众学习，虚心听取并且及时地向党反映人民群众的要求和意见，向人民群众解释党的政策和决议”。

为人民群众服务，必须了解人民群众的要求和意见，必须代表他们的利益，使我们的工作符合群众的要求，符合群众的利益。为了正确地了解群众的要求和意见，必须深入到群众中去，和广大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信任群众，甘当群众的小学生，虚心向群众求教。这样，群众就会信任我们，把自己的真实意见告诉我们。如果一个党员不信任群众，自以为比群众聪明，不虚心向群众求教，那末，群众也就不会信任他，不愿意向他反映自己的真实意见，他也就不能很好地为群众办事。在为群众办事的时候，必须从群众的需要和自愿出发。凡是应该办、可能办而大多数群众又认为需要办的事情，就应该积极领导群众去办；凡是大多数群众认为不应该办的事情，就不要勉强去办。如果一个党员以自己的觉悟程度去衡量广大群众的觉悟程度，以为自己所了解的东西，人民群众也都了解了，以为少数先进分子所同意的事情，广大群众也都同意了，在为群众办事的时候，只凭自己主观上的良好愿望，提出过高的要求，操之过急，超过了群众的实际需要和觉悟程度，办了那些还不应该办



的事情，就会脱离群众。相反，如果一个党员的認識水平落后于大多数群众的認識水平，落后于客观形势的发展，不能站在群众的前面去领导群众，也会脱离群众。

为人民群众服务，还要担负起教育人民群众的责任。党的政策和决议是反映了人民群众的意見和要求、代表了人民群众的利益。但是，要使群众認識到这一点，就必须要在人民群众中进行艰苦的說服教育工作，提高群众的觉悟程度。党的政策必须交给群众，依靠群众自觉地去执行。那种认为“政策只要干部知道就行了”的看法是错误的。党员必须把党的政策原原本本地向群众說清楚，并且結合当地情况，結合群众的思想，耐心地向群众解釋党的政策，使群众完全懂得党的政策。经过党员在群众中的耐心工作，大多数群众都同意了党的政策和决议，党就可以和群众一起行动，使党的政策和决议付诸实现。当群众还不懂得党的政策和决议的时候，在群众中可能有某些不同意的意見，这是很自然的现象。面对这种现象，党员应该首先检查自己是否尽到了责任，及时对群众加强思想工作，不能因为群众还不懂得党的政策而得出群众落后的結論，更不能因此采取简单生硬的办法去贯彻执行党的政策和决议。党的政策和决议在大多数群众同意下付诸实现，并不等于說，可以不重视少数群众的意見，可以放松对少数群众的教育工作。如果一个党员对少数群众的意見采取漠不关心的态度，或者企图以多数群众的意見去压服少数群众的意見，这既不利于說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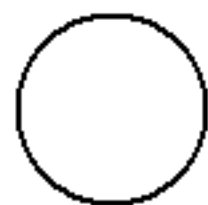
少数群众，使他們觉悟过来，和多数群众一起行动，也不利于多数群众扩大他們的队伍，办好自己的事业。

从群众中来，正确地反映群众的意見和要求，到群众中去，正确地向群众解釋党的政策和决议，是共产党员不可推諉的双重责任，也是党的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的两个不可缺少的方面。

党章規定，共产党员必须“在工作中起模范作用，不断地提高生产技术和业务能力”。

建設社会主义是全国人民的偉大的艰巨的任务。在这个任务面前，每一个共产党员不仅要具有百折不撓的雄心壮志，敢于克服一切困难，勇往直前，而且必须切实地掌握一定的生产技术和业务能力，在各自的工作崗位上，努力完成党和人民交给自己的任务。只有建設社会主义的愿望，而缺乏必要的本领，就不能够对社会主义建設事业有切实的贡献。

在社会主义建設时期，一个共产党员在政治上的作用，主要表现在做好各自崗位上的业务工作，对整个社会主义建設事业有所贡献。各种专业都是实现党的偉大的政治目标的有力武器。一个共产党员如果在农村中工作，就应该努力钻研党的有关政策，学习生产技术，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如果是科学技术工作者，就应该通过科学实践和生产实践，努力为国家經濟建設和国防建設解决问题；如果是教育工作者，就应该通过教学实践，努力为国家培养出优秀人材。我們党还有一部分同志在各种业务机关专门負責



思想政治工作，他們就必須努力通曉思想政治工作的規律，並且努力學習和自己工作有關的專業知識，更好地保證業務工作的開展。總之，每一個共產黨員，都應該懂得專業工作的重要作用，重視專業工作，勤勤懇懇地、堅持不懈地致力於本崗位的專業工作，以最好的專業工作的成果，發揮最大的政治作用。

共產黨員在工作中起模範作用，不斷地提高生產技術和業務能力，還應該表現在具有虛心學習的態度和刻苦鑽研的精神，老老實實地向一切有專長的人學習，取人之長，補己之短。必須看到，黨外有許多人具有豐富的專業知識，共產黨員虛心地向他們學習，和他們密切合作，團結共事，既有利於提高自己的業務能力，也有利於發揮黨外人士的積極性，共同做好工作。

當然，強調一個黨員必須努力提高生產技術和業務能力，並不等於說他就可以忽視政治修養了。在政治上加強鍛煉，不斷地提高自己的覺悟程度，是每一個共產黨員經常要注意的。一個無產階級戰士，任何時候都不會對自己放鬆思想改造。

黨章規定，“實行批評和自我批評，揭露工作中的缺點和錯誤，並且努力加以克服和糾正；向黨的領導機關直到黨的中央委員會報告工作中的缺點和錯誤；同黨內外一切危害黨和人民的利益的現象進行鬥爭”，是每一個黨員都必須履行的義務。

共產黨除了人民的利益之外，再無自己特殊的利益，因而能夠堅持真理、修正錯誤，

能夠運用批評和自我批評的武器來掃除沾染在黨的肌體上的塵埃。毛澤東同志說：“共產黨人必須隨時準備堅持真理，因為任何真理都是符合於人民利益的；共產黨人必須隨時準備修正錯誤，因為任何錯誤都是不符合於人民利益的。”^① 每一個黨員都必須根據毛澤東同志這個指示，在真理和錯誤之間，堅持鮮明的是非標準，以符合於人民利益的為是，以不符合於人民利益的為非。自己有了缺點和錯誤，堅決改正。一個黨員在自己的活動中，如果是非標準不明，就不可能發現自己的缺點和錯誤。一個黨員如果為了個人得失，以是為非，以非為是，就會給黨的事業造成損失。黨員自己不能堅持真理，就不可能幫助別人修正錯誤。堅持真理，修正錯誤，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要做到這一點，必須努力提高自己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水平，提高辨別是非的能力，必須有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思想，克服一切個人主義思想。有個人主義思想的人，在真理和個人利益發生矛盾的時候，往往會為了個人利益，拋棄真理。只有那些堅持黨和人民的利益，真正大公無私的人，才可能具有最大的勇敢，為真理而鬥爭。

共產黨員要善於實事求是地進行批評和自我批評。毛澤東同志說：“黨內批評要防止主觀武斷和把批評庸俗化，說話要有證據，批評要注意政治。”^② 這就是共產黨人進行批

^① 《論聯合政府》，《毛澤東選集》第3卷，第1096頁。

^② 《關於糾正黨內的錯誤思想》，《毛澤東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95頁。



評和自我批評的实事求是的態度。在开展批評時，對待同志的缺點和錯誤，必須實事求是地進行分析，恰如其分地提出批評，不能把思想錯誤說成是政治錯誤，把非原則性的錯誤說成是原則性的錯誤，把偶然的個別的錯誤說成是一貫的系統的錯誤。在黨內开展批評和自我批評，主要是解決是非問題。批評不恰如其分，就不能分清是非，使問題得到真正的解決。同時，有些問題並不是一眼可以看得清楚的。如果在开展批評時採取簡單粗暴的態度，不容許被批評者聲辯和解釋，或者沒有進行認真的、反復的討論，就輕率地作出結論，都不可能達到分清是非、團結同志的目的。

黨章規定，每一個黨員必須“對黨忠誠老實，不隱瞞和歪曲事實真相”。黨的正確領導決定於正確地反映客觀情況，正確地分析客觀情況。共產黨員對黨忠誠老實，如實地反映工作中的真實情況，能夠幫助黨作出正確的決定，同時也有利於幫助黨及時發現和改正工作中的缺點和錯誤。

共產黨員在任何時候都必須保持高度的政治警惕性。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國內外的敵人並沒有睡覺，他們時時刻刻都在企圖破壞我們的建設事業。窮凶極惡的美帝國主義還霸占着我國領土台灣，不斷侵犯我國的領海、領空。在美帝國主義的支持和縱容下，盤據在台灣的蔣介石匪幫正在陰謀侵犯我國大陸沿海地區，妄想恢復反革命統治。每一個黨員必須履行黨章關於黨員義務的規定：“時刻警惕敵人的陰謀活動，保守黨和國家

的機密。”

黨在要求黨員履行義務的同時，還規定了黨員有如下七項權利：“在黨的會議上或者在黨的報刊上參加關於黨的政策的理論和實際問題的自由的、切實的討論”，“對於黨的工作提出建議；在工作中充分發揮創造性”，“黨內的選舉權和被選舉權”，“在黨的會議上批評黨的任何組織和任何工作人員”，“在黨組織對自己作出處分或者鑑定性的決議的時候，要求親自參加”，“對於黨的決議如果有不同意的地方，除了無條件地執行以外，可以保留和向黨的領導機關提出自己的意見”，“向黨的任何一級組織直到中央委員會提出聲明、申訴和控訴。”

黨章關於黨員權利的規定，反映了我們黨是按照民主集中制組織起來的無產階級政黨的本質特點。民主集中制是我們黨的最根本的組織原則。黨的戰鬥力是以全體黨員在黨的集中領導下的思想一致和行動一致為基礎的。黨給予黨員民主權利，正是為了提高黨員的自覺性和主動精神，從思想上鞏固黨的行動的統一。嚴格的集中同廣泛的民主相結合，是我們黨的組織原則的最大優點。黨按照民主集中制所給予黨員的民主權利，正確地反映了在黨的生活中，民主和集中的統一，自由和紀律的統一。在黨中央的統一領導下，黨員正確地行使這些民主權利，就能活躍黨的生活，使黨的組織經常處于一種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紀律又有自由，又有統一意志、又有個人心情舒暢、生動活潑的政治生活中。



黨員在黨內自由地、切實地討論黨的政
策，對黨的工作提出建議，是實行黨內廣
泛的民主的關鍵所在。在黨沒有作出決
議以前，黨員對黨的政策進行自由而切
實的討論，有利於從各個方面提供意見，
從各個角度反映情況，集思廣益，使黨
組織正確地、全面地判斷客觀情況，作
出正確的決議；有利於使黨員提高思想
認識，取得意見一致，行動一致。黨內
的一致意見，是在不同意見充分開展討
論的基礎上取得的。真理只有一個，但
是只有通過認真的討論，才能使人們對
真理的認識逐漸明朗起來。在討論中有
正確的意見，也可能有錯誤的意見。錯
誤的意見可以通過集體討論和黨員認
識的提高而得到改正。黨員只要按照
黨的組織原則發表意見，他的發言權就
應該受到尊重。任何黨的組織和黨員
都不能對發表錯誤意見的黨員採取歧
視的態度，更不能認為他違反了黨的紀
律。對真理的認識有一個反復的過程。在
一般的情況下，多數黨員的意見可能是
正確的，但是，有的時候，少數黨員或
者某一個黨員的意見同多數黨員的意見
不一致，並不能證明真理就在多數這一
邊。因此，尊重少數人保留不同意見的
權利，“這對於黨不但沒有害處，而且
可以有某種益處。只要黨的決議是正確
的，這些持有不同意見的黨員又是願意
服從真理的，他們終于會心悅誠服地認
識黨的正確和自己的錯誤。如果真理最
后被證明是在少數方面，那末，保護少
數的這種權利，也可以使黨更容易地認
識真理。”^①

按照黨章規定，黨員在遵守組織原則的

前提下，有權對任何組織和任何工作人員
提出批評。黨內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
是堅強黨的組織，增加黨的戰鬥力的必
要條件。黨員對黨的任何組織和任何工
作人員實事求是地開展批評，是對黨的
事業高度負責的表現。在開展批評和自
我批評中，領導人做出榜樣是十分重要
的。領導人對自己工作中的缺點和錯誤，
誠懇地而不是敷衍地進行自我批評，並
且積極地支持和接受自下而上的批評，
就能使黨員群眾敢於開展批評，充分行
使黨所給予的權利。對待黨員群眾，採
取“言者無罪”的態度，才能收到“知
無不言，言無不盡”的效果。

按照黨章規定，黨員有權向黨的任何一
級組織直到中央委員會提出聲明、申訴
和控訴。這樣，黨員如果對黨組織的決
議持有不同的意見，或者對任何組織和
任何工作人員提出了批評意見，得不到
合理處理時，就能夠得到充分申述的機
會。各級黨組織對黨員的這種申述當然
要給予應有的重視，作出慎重的處理。
黨章的這項規定，對黨員行使自己的權
利，給予了有力的保障。任何黨的組織
和黨的領導人，都應該把黨員提出聲明、
申訴和控訴，看作是黨內民主生活中的
正常現象，不能認為黨員的這些行為是
對黨的組織或黨的領導人的不尊重。

黨員能否正確地行使黨所給予的權利，
重要的關鍵還在於各級黨組織和領導
幹部是

^① 鄧小平：《關於修改黨的章程的報告》，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1版，第66頁。



否能够按照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原则进行工作，坚决地不折不扣地按照党章办事，向一切违反党章的现象作斗争。

一切党的组织，都应该坚持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发扬党内民主，健全党的组织生活，使党员能够充分地行使党所给予的权利。党的组织如果限制党员行使应有的权利，就会妨碍党员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发挥，这对党的事业是不利的，是违反党章的错误行为，是党所不允许的。尊重党员的权利，也就是尊重党章。各级党组织必须积极地、为党员行使党所给予的权利创造良好条件。如果对党员行使权利采取漠不关心或者放任自流的态度，是错误的。各级党组织应该经常注意克服不利于发扬党内民主的因素，提高党员行使民主权利的积极性；应该经常对党员进行教育，启发他们正确地、积极地行使权利。毛泽东同志指出：“必须在党内施行有关民主生活的教育，使党员懂得什么是民主生活，什么是民主制和集中制的关系，并如何实行民主集中制。”^①

党组织的领导人在党内的民主生活中起模范作用，对活跃党内民主生活具有重要的意义。领导人的思想和工作如何，对党员是否积极地行使自己的权利有着直接的影响。因此，党组织的领导人不仅要和其他党员一样，行使党员的权利，而且要尊重每一个党员的权利，努力保证每一个党员积极地、顺利地行使党所给予的权利。任何党员都不能不尊重其他党员的权利，不以平等态度对待其他党员，更不能以“领导者”自居，违反党

的纪律，侵害党员的权利。如果某个党组织的领导人这样做，就会损害这个党组织的民主生活，损害党员群众的积极性和责任心，就会涣散党的组织，削弱党的战斗力，这显然是错误的。

党员行使党所给予的权利，是对党必须担负的政治责任，是对党的事业具有高度责任心的标志。政治上的权利不同于物质上的享受，党员绝不能放弃党所给予的权利。如果党员对党所给予的权利采取漠不关心的态度，这是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自由主义的表现。毛泽东同志曾经尖锐地指出，这种对革命事业采取漠不关心的自由主义态度的人，是忘记了自己是一个共产党员，把一个共产党员混同于一个普通的老百姓。^②因此，党员必须充分地行使党所给予的权利，参加党的政治生活，从政治上关心党的事业。如果有人压制民主，侵犯党员的权利，就应该起来同这种现象作斗争，向党的领导机关直到中央委员会提出控诉。

党员义务的实质，就是要求广大党员以最大的毅力、最高的智慧，为实现党的纲领而斗争。党员就是为了履行义务而参加党的，不履行义务就不成其为党员，不很好地履行义务，就不是一个好的党员。一个党员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应该自觉地、

^① 《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17页。

^② 参阅《反对自由主义》。《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348页。



无条件地、不折不扣地履行党章规定的义务。我们党是一个有着远大目标的党，党的纲领表明，它不仅要领导全国人民取得革命的胜利，而且要领导全国人民建成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而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过程，也就是不断地向困难作斗争的过程。列宁说过：“谁害怕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困难，谁被这些困难吓倒，谁见了这些困难就悲观起来或者慌张起来，谁就不是社会主义者。”^①“如果没有非常复杂的环境，那末也就没有革命。你怕狼，就别到树林里去。”^②因此，一个共产党员决不能怕任务困难、环境复杂而不努力工作。恰恰相反，越是在困难的时候，越是要我们以顽强的斗争精神去克服困难，认真地履行党员的义务。

党员权利的实质，就是在集中指导下充分发扬民主。在党内生活中，集中和民主是一致的。高度集中，是在党内充分发扬民主，概括和提高广大党员的正确意见的基础上实现的，它是党员行使民主权利的结果。一个党组织如果不能保障党员行使权利，就不能保障这个党组织有健全的民主生活，而没有民主，也就没有集中，这个党组织就会由于处于涣散状态而失去战斗力。党在组织原则上的高度集中和领导人的独断专行有原则上的区别。高度集中是以高度民主为基础的，是实行广泛民主的结果，而领导人的独断专行却只会窒息党内民主。在党内生活中，纪律和民主也是一致的。党内缺乏铁的纪律，固然会瓦解党的战斗力；党内缺乏民主，不能充分发挥党员的积极性和创造

性，也会影响党组织发挥战斗作用。党的纪律表现在党员的行动一致。只有充分发扬民主，才能有自觉的纪律，才能有自觉的行动一致。发扬民主，是加强党的纪律的前提。削弱党内民主，其结果必然会削弱党的纪律，降低党的战斗力。党的正确领导，有赖于党员行使党章给予的权利，发挥集体智慧；党具有永不枯竭的活力，也有赖于党员行使权利，发挥积极性和创造性。一个党员，应该自觉地、认真地、毫不含糊地行使党章规定的权利。在一切党组织中，党员行使党章所规定的权利，都必须得到切实的保障。

党员履行义务，是党员对党应尽的神圣职责，而党员的权利则给予了每一个党员以充分发挥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可能，使他们更好地履行义务。每一个党员必须为实现党的主张而奋斗，必须维护党的利益，必须遵守党的组织原则。因此，忽略了党员义务和权利的任何一方面，都不利于党的事业。把两者统一起来，对党的事业忠心耿耿，认真地履行党员的义务，勇于在政治上对党担责任，正确地行使党员的权利，这样才能够不断地提高自己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觉悟，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出更大的贡献。

① 《从破坏历来的旧制度到创造新制度》。《列宁全集》第30卷，第475—476页。

② 《布尔什维克能保持国家政权吗？》。《列宁全集》第29卷，第100页。



現代資產階級的邏輯實証主義哲學

· 任 華 ·

邏輯實証主義是現代資產階級唯心主義哲學的一個重要流派。它直接繼承了以孔德(1798—1857)、穆勒(1806—1873)等人為代表的實証主義哲學和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廣泛流行的馬赫主義哲學。整個這條實証主義的路綫，實際上是由貝克萊和休謨的主觀唯心主義的經驗主義哲學開始的，因此，邏輯實証主義也叫作邏輯經驗主義。

實証主義實質上是一種主觀唯心主義，但是它並不公開暴露自己的本來面目，而是在尊重經驗和科學的幌子下，偽裝成凌駕于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之上的哲學。實証主義的特點，就在於標榜一種超階級的中間路綫，要求用“實証的”或“科學的”精神來解決一切問題，把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都說成是違背“科學”精神的“形而上學”而加以反對，實際上是維護唯心主義的路綫而反對唯物主義的路綫。

實証主義哲學在帝國

主義時代有了進一步的發展。帝國主義時代的實証主義，首先表現為馬赫主義即經驗批判主義，也表現為差不多同時出現於英美等國的實用主義和新實在論。在這裡，特別應當提一下新實在論。這個學派在歪曲利用現代物理學的同時，也利用隨着現代數學發展起來的數理邏輯，來偷運柏拉圖的客觀唯心主義和貝克萊、休謨的主觀唯心主義。他們主張用所謂“邏輯分析法”來研究哲學，宣稱“邏輯就是哲學的本質”，進而把哲學問題說成是邏輯問題。於是出現了以摩爾(G. E. Moore)和羅素等人為代表的所謂“劍橋分析哲學”潮流。這種思想對於邏輯實証主義的形成起了促進的作用，因此，羅素等人被認為是邏輯實証主義的重要先驅之一。

就其嚴格意義來說，邏輯實証主義出現於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它的開始是二十年代在以奧國維也納為中心的西歐大陸上形成發展起來的維也納學派。其代表人物是石里克、卡爾納普、弗蘭克、奈拉特以及維特根什坦等。他們在為科學提供“穩固的基礎”、取消“形而上學”的口號下，企圖用邏輯分析方法來發揚從貝克萊到馬赫的這一主觀唯心主義哲學傳統，給它改頭換面，把它的真相更加隱蔽起來，却自命是哲學上的“革命”。三十年代希特勒上台以後，維也納學派由於他們的資產階級民主傾向，和法西斯主義發生了一定的矛盾，因此逐漸從歐洲大陸轉移到以保衛資產階級民主自命的英美兩國，主要是轉移到開始成為世界一切反動勢力的大本營的美國。他們的邏輯實証主義思想，很



自然地在这两个国家原有的实用主义、新实在論和分析哲学等主观唯心主义流派結合起来。因而很快地在英美两个国家生根发芽，并且日益扩大其在资本主义世界中的影响，成为最近三十年来支配这两个国家和其他許多资本主义国家哲学界的一个主要流派。

邏輯实证主义出現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完全不是偶然的事情。大家知道，在这个时期，社会主义在地球的六分之一的土地上成为现实，并且逐渐扩大其影响；资本主义制度已經进入了总危机并且不断在发展，使帝国主义进一步走向死亡的道路。面临着这种情况，反动的资产阶级更要加紧反对社会主义革命，反对馬克思主义。他們所采取的一种办法，就是企图否认帝国主义时代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矛盾的更加尖銳化，宣傳所謂中間階級的成长及其所起的日益巨大的作用。邏輯实证主义者正好反映了这一种资产阶级的思想傾向，他們企图掩盖自己的阶级本性，以一种超阶级的姿态出現，在一种新的形式下繼續宣揚实证主义的“中間路綫”的哲学。

同时，这个时期也是馬克思主义哲学和自然科学迅速发展的时期。这种情况，使一部分资产阶级哲学家不采取公开的方式而用隱蔽的方式来宣傳唯心主义。自命为忠实于科学的邏輯实证主义者，更加突出地表现了这种傾向。他們歪曲利用这个时期发展起来的相对論和量子力学，来給实证主义作进一步的論证，特别是他們看中了这个时期已經系統化了的数理邏輯，企图利用它来改造实

证主义，使之取得一种新的形式。

* * *

从上面所讲的，可以看出，邏輯实证主义者不同于旧实证主义者的主要之点，就在于他們是在“邏輯分析”的幌子下宣傳实证主义，反对所謂“形而上学”。实际上，这正是他們宣傳主观唯心主义，反对唯物主义的一种新方法。邏輯实证主义者以尊重經驗科学为口实，赋予旧实证主义的經驗主义原則以更多的科学外观，从而提出他們的所謂“证实理論”和“证实原則”，宣称“一个命題的意义就在于它的证实方法”。表面上看来，这种观点似乎是要求把一切知識放在科学证实的基础上，好像是很科学的，其实不然。因为邏輯实证主义者是把“证实原則”作为决定一个命題是否有意义的最后标准而提出来的，并且根据它来反对“形而上学”。根据这条原則，他們认为，只有局限于感觉經驗范围内的認識，才能够得到证实，才能够有意义。凡是超出感觉經驗范围的認識，都不能得到证实，都是沒有意义的。他們认为，一切肯定經驗以外的实在的命題都是“形而上学”。卡尔納普說：“我将把所有那些要求表达关于某种在一切經驗之上或之外的东西的命題称为形而上学命題”^①。根据他所举的例子，这种命題包括肯定一切本质上都是物质的唯物主义命題和肯定一切都是精神的唯心主义命題，他要求根据“证实原則”来考察这种命題，从而宣布“很容易看到这种命題是不能

^① 《哲学与邏輯語法》，1935年英文版，第15頁。



证实的”^①。因此，“所有这些哲学主张（指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等主张——引者注）都是沒有經驗內容的，沒有理論上的意义，它們都是假論題”^②。

不难看出，邏輯实证主义者的这种观点，同旧实证主义者的观点实际上是一样的。他們的“证实原則”并不是什么真正科学的原則，而仍旧是主观唯心主义的原則。根据这条原則，他們把經驗科学看成是人的感觉經驗的描述，把認識对象归結为这种經驗本身。如果我們肯定有独立于感觉經驗而存在的客观物质世界，并且肯定人們可以通过經驗而認識这个世界，照他們看来，这就是超出了經驗的范围，因此，是不能够得到证实的，是沒有意义的。可見邏輯实证主义者表面上虽然是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都指斥为“形而上学”，实际上他們所反对的“形而上学”主要就是唯物主义。

如果說邏輯实证主义者的这种观点和旧实证主义者有所不同，这就在于他們是在“邏輯分析”的掩飾下提出这种观点的。旧实证主义者着重从人的心理和認識能力的局限性立論，直截了当地肯定人的認識不能越出感觉經驗的范围。在他們看来，一切越出这个范围的企图都是錯誤的。邏輯实证主义者則从“邏輯分析”的观点出发，把他們的“证实原則”說成是決定我們說話有沒有意义的邏輯原則，从而肯定一切“形而上学”的命題不但是錯誤的，而且是根本沒有意义的。卡尔納普說：“邏輯分析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給一个給定的命題找出它的证实方法”^③。这样把

“证实原則”納入邏輯分析之后，他企图把邏輯实证主义者反对“形而上学”的立場同旧实证主义区别开来。他說：“有时維也納小組的观点曾經被誤认为是否认物理世界的实在性，但是我們沒有作这种否定。的确，我們否定关于物理世界的实在性的論点，但是我們不是把它作为錯誤的而是把它作为沒有意义的予以否定。它的唯心主义命題也恰恰遭到同样的否定。我們既不肯定也不否定这些論点，我們否定整个問題。”^④用不着多說，邏輯实证主义和旧实证主义的这种不同，并不是什么本质上的不同，只不过是一种手法上的差别。邏輯实证主义者比旧实证主义者更狡猾，他們玩弄邏輯分析的把戏，企图进一步把他們的主观唯心主义观点和反对唯物主义的真正意图掩盖起来。

邏輯实证主义者用他們在“邏輯分析”的名义下提出来的“证实原則”反对了“形而上学”之后，进而企图利用“邏輯分析”来調和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逃避哲学上的根本問題。在这里更可以看到，他們用来偷运主观唯心主义的方法和旧实证主义者很不相同，因而也就可以更明显地看到了邏輯实证主义的特点。

在西方哲学史上曾經出現过一种唯心主义的观点，认为数学和邏輯的知識是一种先驗的知識。邏輯实证主义者利用現代数学和数理邏輯的高度抽象性和精确性，把这种

①②③④ 《哲学与邏輯語法》，第16、21、10、21頁。



对于数学和邏輯的唯心主义观点繼續加以发展。他們企图把数学和邏輯跟客观世界完全割裂开来，从而制造了两种命題的对立：一方面是数学和邏輯的命題，他們认为，这种命題对于事实完全无所肯定，也就是說并不反映任何客观事物的性质，它們只是一种分析命題或者同語反复命題，因此是先驗的，必然的；另一方面是經驗命題或事实命題，他們认为，这种命題对于事实有所肯定，因此是綜合的，没有什么必然性，只有不同程度的或然性。

在割裂这两种命題的基础上，邏輯实证主义者把哲学和科学也割裂开来。他們說，科学命題是經驗命題，因此沒有必然性，只能是一种具有一定程度或然性的假設；于是科学就不是反映客观物质世界的規律性和必然性的了，变成了只是对感觉經驗过程的描述和預測。邏輯实证主义者把哲学研究看成与事实无关的邏輯分析活动，于是哲学的任务也就不是反映自然、社会及思維的最一般的运动規律，而只在于对日常生活中的某些重要概念和科学的概念进行邏輯的分析。对于哲学的这种看法，英国的所謂分析哲学家已經在邏輯实证主义者之前提出来了。他們认为，哲学不能和科学一样要求发现事实的真理，只能就已有的事实命題和科学命題进行邏輯的分析，以便彻底弄清楚它們的意义。但是英国分析哲学家的这种看法，照邏輯实证主义者看来，还不够彻底，还没有把邏輯的分析同事实的研究完全划清界限。为了作到这一点，他們要求把邏輯分析明确規定为一种

完全不涉及命題内容的純粹形式的、語言的分析。于是和邏輯分析等同起来的哲学也就随之而变成一种語言的分析了。所以，維特根什坦宣称，哲学的任务就是分析我們的語言的邏輯。卡尔納普則进一步明确規定，哲学就是“語言的邏輯語法”。他說：“我們要用科学的邏輯来代替哲学。——这就是說，要用对科学概念和語句的邏輯分析来代替哲学，因为科学的邏輯不是别的而就是科学語言的邏輯語法”^①。

这样把哲学归結为一种語言的分析，邏輯实证主义者就从这里找到了反对“形而上学”和逃避哲学根本問題的一种新方法。他們在根据“证实原則”断定“形而上学”問題是沒有意义的“假問題”的同时，宣称一切哲学上的爭論，首先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爭論，实际上都不是关于事实的爭論，而只是語言上的爭論，因此这种爭論并不帶有根本对立的性质，而是完全可以調和的。

我們可以用卡尔納普提出来的“两种說話方式”的理論为例來說明这一点。卡尔納普认为，应当区别两种不同的說話方式，即所謂“形式的說話方式”和“实质的說話方式”。根据这种理論，科学的命題对事实有所肯定，必須用“实质的說話方式”来表达。但是哲学的命題并不涉及事实，因此不能用“实质的說話方式”来表达，而应当用“形式的說話方式”来表达。傳統的哲学之所以长期陷于“形而上学”的爭論，就是因为本来只应

^① 《語言的邏輯語法》，1937年英文版序，第13頁。



当用“形式的說話方式”表达的哲学命题被哲学家用“实质的說話方式”表达出来，从而引起了无穷的爭論。卡尔納普认为，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爭論就是一个典型例子。照他看来，如果把两方面的看法都翻譯成它們本来的語法形式，那就可以看到双方并不存在着什么事实上的分歧。他說：“假定一个实证主义者（即唯心主义者——引者注）主張这个論点：‘一事物是一种感觉材料的复合’，而一个实在論者（即唯物主义者——引者注）主張：‘一事物是一种原子的复合’。于是关于事物究竟实际是什么这样一个假問題就将引起无穷的爭論。如果我們把它們翻譯成形式的說話方式，在这种情况下，这两个論点是可能調和的。……实证主义和实在論之間的冲突是一种对于假論点的无謂爭論，它的根源完全是由于用了实质的說話方式”①。

英国的邏輯实证主义者艾耶尔也根据类似的观点，来处理現代英国哲学家所喜欢討論的知觉問題。他认为，关于知觉的各种不同的理論，从事实上来看，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它們之間的分歧，只是由于語言选择上的不同。艾耶尔以对于一块銀币的知觉为例，來說明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爭論就是这种性质的爭論。例如，唯物主义者认为銀币有其不以人的感觉为轉移的客观实际形状，唯心主义者则认为它沒有独立于人的感觉的客观实际形状，它的形状是随着人的感觉而改变的。艾耶尔表示，如果把这两种不同的观点看成是事实上的問題，唯物主义者是无法否定唯

心主义者的观点的。因为就事实來說，唯物主义者和唯心主义者之間并没有爭論。他說：“我們（指唯物主义者和唯心主义者——引者注）的不一致究竟何在呢？这就在于他（指唯心主义者——引者注）拒絕用我們描写这些現象的方式去描写这些現象这一事实。我們（指唯物主义者——引者注）說銀币的真正形状是不变的，而他則宁願說它的形状是在經歷着某种周期的变化过程。……但是这些說法所指的事实在两种情形下都是一样的。換言之，我們不是在爭論两套互相冲突的假設哪一个正确，而是在爭論两种語言的选择”②。

从这种观点出发，艾耶尔公然否认哲学上的党派性原則。他說：“在哲学的本质中沒有东西可以保证有互相对抗着的哲学党派或‘学派’存在。……因此，关心哲学底情况的我們，再也不能默許哲学家們之間有党派分歧存在。”③

从上面卡尔納普和艾耶尔的例子，可以大致看出，邏輯实证主义者怎样把邏輯分析說成是語言的分析，把哲学的爭論說成是語言上的爭論，从而企图抹煞哲学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根本对立。他們的这种企图是徒劳无益的。不可否认，随着現代科学特别是物理学的日益精密化，数学的語言和邏輯的分析在科学研究中起着日益重大的作用。它們所以能够起这种作用，是因为它們

① 《語言的邏輯語法》，轉引自康福斯：《科学与唯心主义的对立》，三联书店1954年版，第165頁。

② 《經驗知識基础》，1940年英文版，第18頁。

③ 《語言、真理及邏輯》，轉引自康福斯：《保卫哲学》，三联书店1955年版，第69頁。



更抽象地更深刻地反映了客观实际，从而能够成为处理复杂細微的物质世界現象和解决与此有关的实际問題的有力工具。作为现代科学的概括和总结的哲学，正应当从这个角度上来看数学和邏輯的分析，給它們以恰如其分的估价。但是，邏輯实证主义者却不是这样，他們歪曲利用现代数学和邏輯分析的成果，把它們的作用片面夸大到不适当的地步，以至把它們完全同客观世界割裂开来，变成一个同外界絕緣的独立王国。这样，邏輯分析就被他們說成是一种可以完全不顾事实的純粹語言分析，这显然是对邏輯分析的一种歪曲。邏輯实证主义者之所以不顾一切坚持这种观点，归根到底，无非是企图掩盖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这一斗争的阶级实质及其在世界观上的根本对立，但这是絕對作不到的事情。哲学上的根本問題是迴避不了的。邏輯实证主义者的語言分析哲学，实际上也不是什么超然的純粹語言分析，而是一种主观唯心主义。这一点可以从艾耶尔的例子清楚地看到。他之所以认为在对于銀币的形状的看法上唯物主义者不能駁倒唯心主义者，是因为他认为两者所面对的乃是同样的事实。但果真是这样嗎？显然不是这样。认为銀币的形状就是感觉形状，和认为它的形状是独立于感觉而存在的，感觉形状只不过是其反映，显然是两件很不相同的事实。艾耶尔恰恰是要抹煞这一点，硬把两件事實說成是一件事實，其結果就是只承认感觉是事实，感觉以外的东西不是事实。这不就是主观唯心主义的观点嗎？自己已經站在主观唯心主义

的立場上，再要來反駁主观唯心主义，那当然是駁不倒的了。

* * *

邏輯实证主义傳入美国以后，在美国的实用主义影响之下，有了某些改变和发展。这种发展的表現是五花八門的。它和实用主义的直接結合产生了以路易斯 (C. I. Lewis) 为代表的“概念实用主义”。这种哲学可以說 是利用邏輯实证主义的邏輯分析观点来改进实用主义的一种企图。此外，某些服膺邏輯实证主义的自然科学家如布里治曼 (Bridgman)、弗兰克 (P. Frank) 及倫日恩 (V. Lenzen) 等，把邏輯实证主义和实用主义的精神結合起来，提出所謂“操作論” (Operationalism)。他們断言，自然科学上的基本概念不是客观事物的本质的反映，而是代表科学家在研究自然現象时所进行的一系列观察实验的操作活动，从而对自然科学作出了唯心主义的、相对主义的解釋。

邏輯实证主义和实用主义合流的一种最突出的表現，就是所謂“語义哲学”的形成。当然，“語义哲学”的产生还有其他的原因，但是实用主义的影响是一个重要的原因。美国的实用主义者莫里斯 (C. W. Morris) 企图用实用主义来补充邏輯实证主义，提出所謂“符号学”，并且主張把語义学作为它的一个組成部分。卡尔納普接受了这种主張，把邏輯实证主义从所謂“語法学”的研究推广到所謂“語义学”的研究，从而把“語义哲学”发展起来。“語义哲学”要求不再把哲学局限于語言的邏輯語法，而认为哲学也应当涉及語



言及其“所指”的关系問題，也就是語言的意義問題。但是这样作的結果，不过是使邏輯实证主义在一定程度上又回到旧实证主义的老路上去，因而更加暴露了它的主观唯心主义的实质。卡尔納普所提出来的“統一科学”和“物理主义”的理論可以說明这一点。简单說来，这种理論主張用所謂“物理的語言”来达到把各門科学統一起来的目的，其本身已經是一种唯心主义的观点。但是，我們在这里特別需要指出來的是：卡尔納普所謂“物理語言”的基础乃是他所謂的“观察語句”或“記錄語句”，而这种語句实际上是物理学家的感觉經驗与观测活动的記錄和描述。因此，他的“統一科学”和“物理主义”理論，归根到底还是实证主义者把認識限制于感觉經驗，把客观物质世界归结为这种經驗的老一套。如果說“語义哲学”要讲語言符号的“所指”，其“所指”正就是这种經驗。如果說，它还没有完全回复到旧的实证主义，那仍然是因为它蒙上了一层語言分析的烟幕，充滿了貌似高深的語言符号运算罢了。

卡尔納普的这种“語义哲学”，和差不多同时在美国流行的所謂“通俗語义学”是孿生的兄弟，可以說都是邏輯实证主义和实用主义合流的結果。以切斯 (chase)、哈雅卡瓦 (Hayakawa) 及弗格特 (Vogt) 等人为代表的“通俗語义学”，直接使“語义哲学”为帝国主义服务。他們根据“語义哲学”的原则，认为实在就是感觉，人們所使用的名詞或概念的“所指”也只能是感觉。因此，他們断定“社会主义”、“資本主义”、“階級”和“階級斗争”

等等概念，都只是空洞的名詞，不反映任何客观实际情况。于是他們得出結論說，馬克思主义的階級斗争和无产階級革命的学說是没有根据的，是濫用語言的結果。他們宣称，当前社会政治上的根本問題，归根到底是由于語言上的混乱引起的。在他們看来，如果我們認識到語言对于人的情感的支配作用，努力澄清这种語言上的混乱現象，把“共产主义”、“帝国主义”等空洞的但是容易激动人的情感的名詞从詞汇上划掉，似乎天下就可以太平了。

* * *

邏輯实证主义者把哲学变成語言的分析，形成一种新的煩瑣哲学的恶劣風气，使哲学日益走上脱离实际的道路，充分表现了帝国主义时代資產階級哲学的腐朽墮落的性质。这种情况，在与邏輯实证主义結合以后的英国“分析哲学”中表现得尤为突出。最近三十年来，标志着英国資產階級哲学发展主流的“分析哲学”，不但愈加陷于煩瑣空洞的語言分析活动，而且簡直把长时期以来哲学上的爭論問題整个說成是一連串的語言混乱，把哲学的作用降低到治疗这种語言病症的医疗术的地位，使哲学走上了絕路。最近十多年来，在英国哲学界声望很高的分析哲学家莱尔 (G. Ryle) 就明白宣称，一切哲学問題都是語言混乱的結果。因此，今后哲学的任务，在于“发现語言成語中不断出現的錯誤构造与荒謬理論的来源”。在一九四九年出版的風行一时的《心的概念》一书中，莱尔把傳統哲学中对“心灵”的看法以及



与此相联系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对立，都说成是一种“范畴的错误”，而这种错误是“由于不能使用英文词汇中某些词目而产生的”^①。维特根什坦在其死后出版的《哲学研究》一书中，把他自己早期的逻辑实证主义观点也否定了，公然宣称：“当我们研究哲学的时候，我们就像野蛮人，原始人一样，听到文明人的话，给这些话加上错误的解释，然后由之得出最奇怪的结论”^②。他认为，语言的形式和作用这样复杂，使我们陷于混乱，找不到出路。因此他说：“我不知道我该往哪里走？”^③而研究哲学的目的仿佛“就在于给苍蝇指点飞出苍蝇罐的道路”^④。这就等于给逻辑实证主义敲了丧钟，宣布它已到了穷途末路和濒于死亡了。

* * *

逻辑实证主义者的烦琐的“语言分析”哲学，有它的社会阶级基础，它反映了腐朽的资产阶级企图逃避现实和麻痹人民的阶级意识的一面。不过这只是一个方面。腐朽的资产阶级还有它的倒行逆施和垂死挣扎的一面，而这一面在逻辑实证主义者当中也不可能是毫无反映的。有一种看法，以为逻辑实证主义者是一批完全脱离实际的哲学家，把自己关在抽象的概念分析的象牙之塔内，不关心社会政治问题。这是不符合实际的想法，顶多也只是看到一些表面现象。逻辑实证主义者不可能没有他们的社会政治观点，不过在一般的情况下，他们的这种观点是隐蔽的，没有明白地表述出来，但是在阶级矛盾尖锐化的时候，他们就不能够再保持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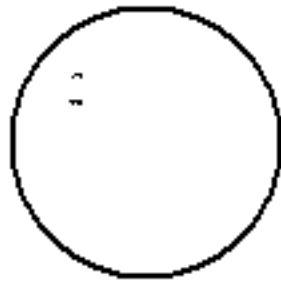
默，而把他们的这种观点全盘托出了。

逻辑实证主义的一个著名代表波普耳(K. Popper)，在一九四五年出版的在资本主义世界受到普遍赞扬的《敞开的社会及其敌人》一书中，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波普耳在这本书里，恶毒地把社会主义社会诬蔑为“封闭的社会”，把资本主义社会赞扬为“敞开的社会”。他把马克思主义说成是柏拉图和黑格尔的集权主义思想的继续，进而系统地攻击马克思主义。他从逻辑实证主义的观点出发，采取所谓“方法论的唯名论”和“事实与决定的批判二元论”，作为他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原则。波普耳把所谓“方法论的唯名论”和所谓“方法论的本质论”对立起来，宣称后者认为科学的任务在于“发现和描述事物的真正性质”^⑤，这是一种柏拉图主义，一种经院哲学。“方法论的唯名论”则是“现在自然科学中所一般接受的”，“它不以发现事物实在是什么为目的”，“而认为科学的目的只在于描述我们经验的事物和事变”^⑥。可见，他所谓“方法论的唯名论”，实际上就是实证主义者所主张的科学只是描述感觉现象，而不过问事物的本质的主观唯心主义。波普耳所谓“事实与决定的批判二元论”，则是逻辑实证主义者的主观唯心主义的社会学及伦理学的表现。根据这种观点，他要求把自然规律和所谓“规范规律”严格区别开来，

① 《心的概念》，1949年英文版，第17页。

②③④ 《哲学研究》，1953年英文版，第194、123、309条。

⑤⑥ 《敞开的社会及其敌人》第1卷，1952年英文版第2版，第31、32页。



后者只是一种人为的“約定”，“并不描述事实”，因此只能有好坏、对錯、可以接受或不能接受之分，不能有真假之別^①。在这两种观点指导下，波普耳企图反对历史主义，反对社会历史的規律性。他說：“历史主义者不承认是我們选择安排历史事实，而相信历史本身或人类的历史以其固有的規律决定我們自己，我們的問題，我們的未来，甚至我們的观点”^②，他认为这是完全沒有根据的。他直截了当地宣布：“不可能有‘如实发生的过去’的历史，只能有各种历史的解釋”^③，“不可能有历史的規律”^④，“历史沒有意义”。不过，他說，“虽然历史沒有意义，我們可以給它一种意义”^⑤。他还說，“事实本身沒有意义，它們只能通过我們的决定得到意义”^⑥。

波普耳根据邏輯实证主义观点进而攻击馬克思主义的社会革命学說，宣揚资产阶级的民主和改良主义思想。他把馬克思主义的社会革命学說說成是一种“空想的社会工程”。照他看来，既然根本沒有社会历史的規律，这种学說也就只是一种毫无根据的空想。他认为这就是“历史主义的貧乏”的表现。

波普耳宣称，他要大力反对馬克思主义的这种“空想的社会工程”，坚持所謂“一点一滴的工程”。为什么他要反对这种“空想的社会工程”呢？因为照他看来，这种社会工程“主張把社会整个加以改造”，“要求为整个社会合理地作出計劃”^⑦，制定藍图，特别是因为馬克思主义者相信，资产阶级与无

产阶级的斗争必将导致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他认为，由于“未来是不确定的”，“社会生活是复杂的”，“我們的經驗是有限的”，这些都是不切实际的想法，尤其是无产阶级革命这一点更是他所深恶痛絕的。他說：“我願意讲得十分明确，就是这种对于一次可能的暴力革命的預言，我认为，从实际政治的观点来看，乃是馬克思主义中最有害的因素”^⑧。

那么，波普耳所推荐的“一点一滴的工程”又是什么呢？照他看来，这就是一种改进社会的方法。“采取这种方法的政治家在他的眼前可以有也可以沒有一幅社会的藍图，他可以希望也可以不希望人类将有一天实现一种理想的国家，在地球上获致幸福与完善”^⑨。他可以用“发展技术来直接改进我們生活于其中的世界，提出一种方法来进行一点一滴的工程，进行民主的干涉”^⑩，使“无限制的资本主义让位于經济的干涉主义”^⑪。总而言之，照波普耳看来，就是不应当用革命的办法来推翻资本主义制度，使人民免于剝削和压迫，只应当在保存资本主义制度的条件下，用资产阶级民主的方式来对它进行一点一滴的改良。这就是他所津津乐道的“一点一滴的工程”的基本思想。这里并没有什么新鮮的东西，只不过是资产阶级思想

①⑦⑧ 《敞开的社会及其敌人》第1卷，第58、161、158頁。

②③④⑤⑥⑨⑩⑪ 《敞开的社会及其敌人》第2卷，第269、268、264、278、278—279、151、143、125頁。



家为垂死的资本主义制度所作的又一次辩护罢了。

* * *

逻辑实证主义在资本主义世界，特别是在它的一些中上层知识分子和自然科学家中，影响是比较广泛的。这首先是因为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矛盾尖锐化的时代，这种哲学的超阶级的外貌，对于这些人具有一种迷惑的作用。同时，也由于在科学昌明的时代，这种哲学集中地歪曲利用了最新的科学成果，标榜感觉经验和科学证实的重要，自

命讲求推理的严格性和精确性，取得了一种科学的外观，因此它对于这些人就具有一种吸引力。正是由于这些缘故，所以这种哲学在旧中国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当中，也曾经有过一定的影响。显然，和其他一些在资本主义世界流行的露骨的反科学、反理性的哲学流派比较起来，这种哲学的欺骗性是比较大的。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它的危害性也是比较大的。因此，对于逻辑实证主义的全面深入的批判，是马克思主义者的一项重要任务。

关于诡辩论

——读书札记

· 邵 铁 真 ·

列宁在他的著作中，有不少地方揭露了马克思主义的各种敌人所惯用的诡辩手法，划清了辩证法和诡辩论的界限。学习列宁有关这方面的论述，对于锻炼我们的思想批判能力十分有益。这里简略地记下几点。

什么叫诡辩？列宁曾简单明了地揭示了诡辩的特征，说诡辩的方法往往是“离开事变的内部联系而抓住事件的表面相似之处。”^①就是说，诡辩是抽掉了事物的本质的东西，而只抓住了事物的外表相似的东西，并以后者来否定前者。

玩弄诡辩术的人，从表面看来，似乎能

言善辩，道理很多，实际上只是主观主义地玩弄一些概念，做些歪曲的论证，为荒谬的理论和行为作辩护。诡辩论者看来好像应用了概念的灵活性，其实，正如列宁所指出的，他们是主观地、任意地应用概念的灵活性。“概念的全面的、普遍的灵活性，达到了对立面统一的灵活性，——这就是问题的实质所在。这种灵活性，如果加以主观的应用——折衷主义与诡辩。客观地应用的灵活性，即反映物质过程的全面性及其统一的灵活性，就是辩证法，就是世界的永恒发展的

^① 《俄国的林特古姆派》。《列宁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版，第99页。



正确反映。”^① 詭辯論者不是客观地应用了概念的灵活性，相反地是对概念的应用“灵活”到荒謬的程度，离开客观的具体事物，而成为主观上任意变幻的“思想魔术”。

詭辯論者为了达到詭辯的目的，所采取的手法是多种多样的，这一点我們可以从历来的机会主义者、修正主义者那里找到很多事例。列宁在同第二国际的机会主义、修正主义作斗争中，曾揭露了机会主义者和修正主义者的本质和种种詭辯手法，捍卫了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

偷換概念，混淆界限，这是修正主义者最經常采用的詭辯术。例如，关于国家学說問題，馬克思主义者常常論述到的有两种“过渡”：一种是从资产阶级专政向无产阶级专政的“过渡”；另一种是从无产阶级专政国家向无国家“过渡”，即国家消亡問題。这是两种性质完全不同的“过渡”。前一种“过渡”，是要摧毁旧的资产阶级国家統治机器，建立无产阶级新的国家机器；不这样，就不可能实现什么“过渡”。后一种“过渡”，则是按照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发展的各种内外条件，使国家的职能逐渐自行消亡下去，根本不是什么破坏国家机器的問題。可是，考茨基和王德威尔得之流为了迎合资产阶级，取消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却抓住上述两种“过渡”的表面相似之处，把两者的界限混淆起来，在无产阶级革命問題上，企图用后一种“过渡”来代替前一种“过渡”，这就是說，无产阶级进行革命斗争，由资产阶级国家向无产阶级国家“过渡”，不需要推翻资产阶级的統治，不

需要打碎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列宁指出，这种混淆“过渡”的界限，就是用“詭辯术代替辩证法”，是一种“掩盖背棄革命的行为”^②！

轉移論点，将一个問題偷換成另外的問題，这也是修正主义者常用的詭辯术之一。例如，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时，許多国家的资产阶级为了掩盖自己发动战争的罪恶，欺騙国内广大人民群众，說这次战争的爆发他們沒有責任，是由別国发动的。这时，摆在各国无产阶级革命者面前的問題是：参与资产阶级对人民的欺騙宣傳，还是揭露资产阶级发动战争的罪恶？但是，当时德国的考茨基和俄国的波特列索夫等人避而不回答这一問題，却提出另外一个問題来討論，这就是：从世界无产阶级利益的观点来看，在战争双方中哪一方面的胜利最有利或最有害？这样就把原来的問題的性質完全改变了。原来的問題的意思是，作为革命的馬克思主义者是否应该支持帝国主义之間的强盜战争；而考茨基和波特列索夫等人所提的問題，則是避开上述尖銳的根本的問題，把問題換成帝国主义战争的双方，哪一方胜利最为有利，从而偷偷地把革命的馬克思主义者应该参加和支持帝国主义之間的战争这种荒謬的观点当作前提，来毒化人們的头脑。考茨基和波特列索夫等人玩弄这样的詭辯术，是企图使馬克思主义者支持本国资产阶级所发动的战

① 《黑格尔〈邏輯学〉一书摘要》。《列宁全集》第33卷，第112頁。

② 《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列宁全集》第28卷，第304、305頁。



爭，使馬克思主义者蜕变为社会沙文主义者。列宁严厉地痛責道：这班“坏到极点的詭辯家”，“都是在用詭辯替民族自由主义工人政策辯护，根本背棄了馬克思主义”^①。

抽象地談論問題，不作具体分析，这也是修正主义者常用的詭辯术之一。从辯证法的观点看来，人們对任何事物的認識，只能根据一定具体条件下的事实，并研究与該事实有关的一切情况，才能作出正确的判断。就是說，要对客观事物进行具体分析，而不能抽象地談論事情的好坏。例如，暴力是好还是坏？抽象地提出这种問題，根本不可能有正确的答案，因为这里首先应当弄清楚的是哪一种暴力，是誰对誰以及为什么使用暴力。不作这种具体分析，是不可能得出正确的結論的。修正主义者每当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时，总是抽象地談論暴力問題，认为一切暴力都是坏的，要不得的。列宁說：“只談一般‘暴力’，而不分析反动暴力和革命暴力不同的条件，就是背棄革命的市儈，或者简直是进行詭辯，自欺欺人。”^②

修正主义者在引证馬克思主义詞句方面的情形也是这样。他們总是离开具体的历史条件，抽象地引用一些分明与当前实际情况根本不符合的例子来作证。例如，馬克思在十九世紀七十年代，曾认为英国和美国有可能通过和平的方式过渡到社会主义，这是根据当时英国和美国还没有壟断的資本主义和官僚軍閥制度而提出来的。馬克思在当时也认为这只是一种例外情况。如果把馬克思的这一論断，任意加以夸大和搬用，把它說成是适用于当时所有資本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甚至也适用于帝国主义时代的一切資

本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显然，这就完全歪曲和背棄了馬克思的原意。历来的修正主义者为了反对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学說，常常抽象地援引这个例子，而不分析自由資本主义时代和帝国主义时代的不同特点，不具体分析各个国家的具体情况和特点，企图从这里得出一个反馬克思主义的結論：在帝国主义时代的一切資本主义国家里，无产阶级不采用革命的方式，不推翻資本主义制度，不打碎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都能“和平”地过渡到社会主义。对于修正主义者的这种手法，列宁指出：“这是詭辯，通俗一点說，这是用引证来騙人。”^③

詭辯論者还常用这样一种手法，就是根据一事物能够轉化为他事物为理由，来抹煞这两种事物間的本质差別。例如，在战争問題上，詭辯論者根据一种战争能够轉化为他种战争为理由，来抹煞帝国主义战争和民族战争之間的本质差別。列宁指出，馬克思主义辯证法的基本原理是：自然界和社会中的一切界限都是有条件的和可变动着的，没有任何一种現象不在一定条件下轉化为自己的对立面。民族战争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轉化为帝国主义战争，而帝国主义战争在一定条件下也可以轉化为民族战争。只有詭辯家才会根据一种战争可以轉化为他种战争的理由，来抹煞帝国主义战争和民族战争之間的差別。列宁說：“我們始終是辯证論者，我們同詭辯論作斗争时，所使用的手段不是根本否认

① 《社会沙文主义者的詭辯》，《列宁全集》第21卷，第160、161頁。

②③ 《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列宁全集》第28卷，第266—267、91頁。



任何转化的可能性，而是对某一事物及其环境和发展进行具体的分析。”^①

事物的形式和内容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复杂的关系，类似的形式在不同条件下可以包含不同的内容，同样的内容在不同条件下也可以表现为多种多样的形式。有时，事物的形式变化了，内容并没有根本改变。诡辩论者却常常利用形式的变化来偷换为内容的变化。例如，在帝国主义之间，在各种不同条件下，相互斗争的形式是会发生变化的，今天可以采取战争或半战争的形式，明天又可以采取和平协商的形式。但是，他们的斗争的实质即分割世界和掠夺殖民地，是不会改变的。修正主义者考茨基曾把各国资本家之间的斗争形式的转换，说成是内容的改变，说成是帝国主义本性的改变。他认为在帝国主义时代，各国财政资本集团之间可以达成协议，建立一个超出一国范围的世界财政资本的消除了竞争的垄断联合，即所谓“超帝国主义”。实质上是企图在群众中制造“在资本主义下可能达到永久和平的幻想”^②。列宁指出：“这种意见在理论上是绝顶荒谬的，而在实践上是一种诡辩，是一种用欺瞒的方法替最恶劣的机会主义辩护的手段。”“全资本家同盟互相斗争与妥协的形式（今天是和平的，明天不是和平的，后天又不是和平的）问题来偷换斗争和妥协的内容问题，就等于堕落成诡辩家。”^③

列宁除了揭露诡辩论者的种种手法外，还分析了诡辩论的认识论根源。他指出，客观事物的联系是极其复杂的，“任何事物都具有‘许多’——‘内容的规定、关系和见解’”，人们“可以提出赞同或反对的论据”，但“这

样的论据没有包括《事物的全貌》，没有《穷尽》事物”^④。人们在讨论和分析问题时，如果任意“抓住论据之中的一个”而作出结论来，这就成了诡辩。诡辩论的认识论基础是相对主义。在诡辩论者看来，世界上一切事物都是相对的，一切是非都是没有客观标准的。“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这就是他们的真理观。列宁说：“把相对主义作为认识论的基础，就必然使自己不是陷入绝对怀疑论、不可知论和诡辩，就是陷入主观主义。”^⑤修正主义者玩弄诡辩术，在认识论上必然陷入相对主义，他们对客观事物的认识只能是片面的、歪曲的，在他们那里，客观真理是根本不存在的。

诡辩论尽管被马克思主义者戳穿得体无完肤，已成为残破不堪的东西，但是由于诡辩论者是极其狡猾的，有时还用科学的外衣伪装起来，用一些似是而非的东西，冒充辩证法，往往就容易欺骗和迷惑一些人。现代修正主义者正是这样，他们每当修正马克思主义某一原理时，总是打着“科学”的旗帜，玩弄诡辩术，以达到反对马克思主义的目的。为了同现代修正主义进行坚决的斗争，揭露现代修正主义者的嘴脸和手法，认真地学习列宁有关这方面的论述，是非常必要的。

① 《论尤尼乌斯的小册子》。《列宁全集》第22卷，第302—303页。

②③ 《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全集》第29卷，第287、245、246页。

④ 《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列宁全集》第38卷，第153页。

⑤ 《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列宁全集》第14卷，第136页。



徒劳的“修漏补缺”

——从腊斯克波恩之行看美国西德之间的裂痕

· 席 林 生 ·

六月下旬，美国国务卿腊斯克在十天的西欧旅行中访问了波恩。他一下飞机，立即对西德总理阿登纳大加奉承，称他是“伟大的总理”、“垂名青史的人物”和“西方团结的缔造者”。据说，腊斯克这种肉麻的恭维，消除了最近波恩和华盛顿的“紧张关系”，“取得了对西方联盟极其需要的修漏补缺的效果”。

美国国务卿的这种“奉承”和“恭维”，是否真的这样容易地消除了波恩和华盛顿的“紧张关系”暂且不谈，问题是美国和西德之间究竟有什么漏洞和缺口需要这个美国国务卿特地横渡大西洋去修补一番呢？

美国和西德之间的漏洞和缺口是不难找到的。就在美国国务卿访问西欧前后，西方报刊和通讯社大量报道了华盛顿和波恩之间的“信任危机”。当时从这两个首都传出来的是不协调的声音。例如，美国企图在西柏林问题上结成西方对付苏联的统一战线，由美国代表西方同苏联谈判；但是阿登纳却公开说美国对西柏林通道问题的建议是“行不通的”，并且暗中支持法国抵制美国在东西方外交上的领导。肯尼迪政府竭力压迫西德、法国让英国参加共同市场，以便组成一个由美国控制的“大西洋经济共同体”；阿登纳却强调“共同市场的范围决不能延伸得太

远”，并且表示“应该赞同的是大西洋伙伴关系，而不是大西洋共同体”。尽管美国力图在欧洲孤立戴高乐以挫败法国建立“独立核打击力量”和“小欧洲”的计划，阿登纳却不断强调西德同法国的“十分亲密的友谊关系”，鼓吹法（西）德合作是西德对外政策的“基石”。美国和西德双方的调子显然是格格不入的。连美联社也说：“华盛顿和波恩之间的紧张关系看来是加剧了，这可能在盟国的队伍中造成危机。这种紧张关系反映出双方越来越缺乏信任。”据说，西德总理阿登纳私下表示：西德同美国政府的关系“比过去十三年中任何时候都要糟糕”。

西德，这个过去一向被美国报纸称为美国“最忠诚”“最坚定”的“盟国”，为什么现在同美国的关系却变得“糟糕”了呢？据西方通讯社说，这是因为阿登纳和肯尼迪“个人关系”的“恶化”。这当然是欺人之谈。人们只要看一看美国和西德关系的实际发展，就能发现华盛顿同波恩不和的原因，远比个人好恶深刻得多。

西德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一个战败国，它的再起完全是美国一手扶植的。战后以来，美帝国主义为了把西德军国主义者从失败的废墟中拉起来，曾经花费了好几十亿



美元。美国这样做无非是为了控制西德，以便在军事上利用它作为发动侵略战争的突击力量，在经济上利用它的工业潜力为美国垄断资本的扩张谋利。但是，经过十几年的发展，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力量的对比发生了显著的变化，西德在经济上成了美国和一个有力竞争者。西德的工业生产从一九五〇年到一九六〇年增加了一倍半，而同期美国和英国都只增加百分之四十几。一九四八年，美国工业生产占资本主义世界工业生产的百分之五十三点四，一九六一年已下降到百分之四十三点三；同期，英国从百分之十一二跌到百分之九；而西德却从百分之三点六猛升到百分之九。在资本主义世界的出口方面，美国所占比重从一九四七年的百分之三十二点五下降到一九六一年的百分之十七点七；同期，英国从百分之九点八降至百分之九点一，而西德却从百分之零点五增加到百分之十点七。

帝国主义国家这种经济力量的变化，自然不能不在它们彼此间的关系中强烈地反映出来。随着西德实力的逐渐增强，它在政治上、军事上由于国际条约束缚而不得不居于二等国地位的情况，也越来越同它在经济上头等国地位相矛盾。因此，近年来西德一直力图冲破限制，改变现有的地位。西德的这种要求特别集中在夺取原子武器这一点上。西德军国主义者看到，目前同它争夺西欧领导权的对手——英国和法国都已掌握了原子武器，如果自己手里没有这种武器，它就不能摆脱屈居人下的局面。但是，由于西德是战败国，目前还受国际条约的限制，不能自己单独制造原子武器，它今天取得原子武器的

可能途径，就是通过美国和北大西洋集团的所谓“集体防务”。因此，西德对于艾森豪威尔政府下台前所拟定的所谓北大西洋集团“第四核打击力量”方案是十分感兴趣的。

但是，肯尼迪政府为了保持美国对核武器的垄断，巩固美国在西方的领导地位，不仅收回了艾森豪威尔的“第四核打击力量”的计划，甚至比艾森豪威尔更严厉地逼迫“盟国”作出“牺牲”，放弃“独立核打击力量”，反而增加常规部队，为美国提供炮灰。美国这样做，显然还想借此加强帝国主义集团发动“有限战争”的能力，使西欧国家服从于美国的“全球战略”。

西德对于肯尼迪政府驱使“盟国”增加常规军队的要求并不反对，因为这有助于加强西德的军事力量。肯尼迪压迫“盟国”放弃“独立核打击力量”也对西德有好处，因为这可以逼出英国和法国手上的原子武装，从而削弱它们同西德争夺西欧霸权的力量。但是对美国撤回北大西洋集团“第四核打击力量”的计划，西德是极为不满的。因为这实际上等于剥夺了西德掌握核武器的权利。针对肯尼迪的这种做法，西德当权人物不断发出“西德不能受歧视”、“必须装备原子武器”的叫嚷。在去年年底的北大西洋集团理事会上，西德一方面同英法一起力图打破美国对核武器的控制，另一方面又提出和美国共同掌握北大西洋集团核威慑力量的建议。当这一切没有成功之后，西德国防部长依然不死心，他又恶狠狠地叫嚷北大西洋集团必须在今后一年内解决核武器的问题。

美国和西德在西柏林问题的策略上也发生了公开的分歧。当然，在西柏林问题上，



美国和西德的立场实质上是一致的。它们顽固地拒绝苏联的建议，继续坚持对西柏林的无理占领，把它作为反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冷战基地。它们还拒不承认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主权，并且梦想消灭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但是由于各自利害关系的不同，美国和西德在解决西柏林问题的方法和某些具体要求上也就存在不同的意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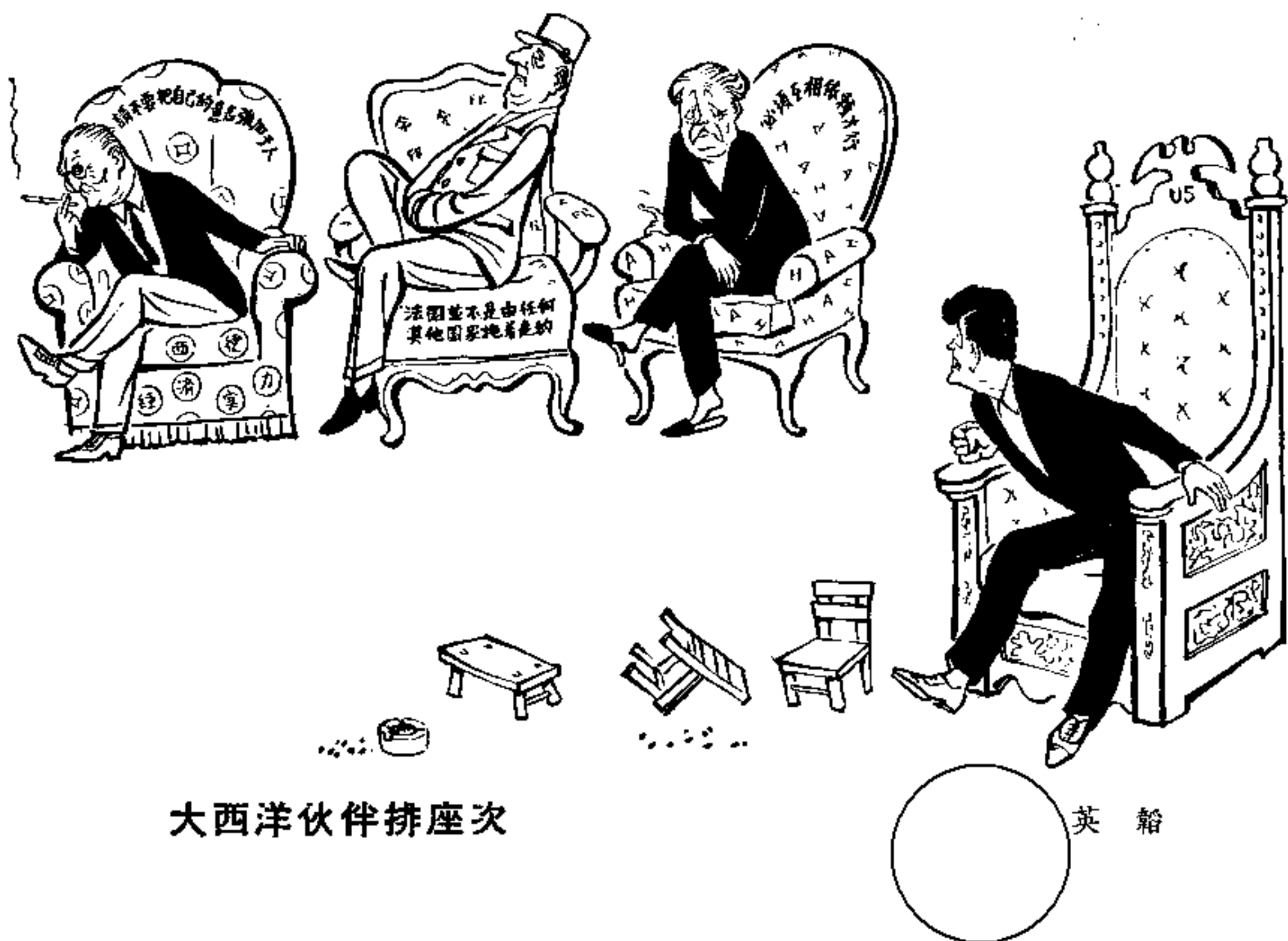
美国从它的战略利益出发，在西柏林问题上，一方面煽起“柏林危机”，加紧扩军备战，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战争威胁；另一方面又主张在一定条件下同社会主义国家保持接触和谈判，以便利用谈判来达到它长期霸占西柏林的目的。但是，西德所关心的是如何利用它的经济潜力，打破它在政治和军事上的不平等地位，以便进一步进行经济和军事扩张。西德害怕西柏林问题的谈判妨碍它夺取西欧的军事霸权，特别担心英国会乘机利用西柏林问题的谈判来削弱它的政治地位和约束它在军事上的扩张。因此，西德对美国在西柏林问题上的谈判一直心怀疑虑。几个月以来，西德政府不时散布美苏会谈“没有成就”的空气，还故意事先泄漏了美国的“柏林方案”以引起“盟国”反对，来破坏美国的谈判计划，并且利用法国作为代言人来牵制美英。

肯尼迪政府在北大西洋集团的核武装问题和西柏林问题上，这种“只从自己的利益出发而不从盟邦的利益出发”的做法，使阿登纳“强烈怀疑西德的利益在盎格鲁—撒克逊手中是否安全”。阿登纳政府正在竭力摆

脱美国的控制，并且利用共同市场的力量来同美国对抗，以保障自身的利益，夺取西欧霸权。为了抵制美国，抬高西德的地位，阿登纳不断叫嚷美国不应“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欧洲“必须要成为美国的有价值的伙伴”。在这方面，法国的戴高乐显然成了阿登纳的同盟军。法国是西德在共同市场中的主要伙伴，有着相互接近的经济基础。由于美国反对戴高乐的“独立核打击力量”和“小欧洲”计划而引起美法矛盾尖锐化，戴高乐竭力要借助西德的支持来逼使美国承认法国的大国地位。同时，西德在西柏林问题上也需要法国撑腰。正是这种共同的利害关系使得阿登纳和戴高乐特别亲热。两个人你吹我捧，说了“许多友好和和解的话”。七月初，阿登纳到法国进行为期一周的访问，戴高乐给予了“超过”常规的“隆重接待”。尽管美国不喜欢戴高乐的“统一欧洲”的计划，美国国务卿腊斯克在访问波恩时还特地向阿登纳做工作，企图分化西德、法国轴心。但是，阿登纳到巴黎时却强调西欧政治统一“必须要毫无耽擱地向前进”，并且同戴高乐一起向美国示威性地大谈法（西）德的“团结”是欧洲政治的“基础”。

当然，这一切并不是说，今天美国同西德的矛盾已经发展到分道扬镳的程度。目前西德在原子武装和在北大西洋集团内进行军事扩张方面，还有赖于美国的帮助，西德对美国的反抗还不能不有一定的限度。同时，在西柏林问题上，尽管双方存在着策略上的分歧，但是它们都竭力反对社会主义国家，





大西洋伙伴排座次

英 翰

在对待西柏林问题的根本立场上是一致的。最近有消息说，西德为了取得美国在核武器上的帮助，多少缓和了一些对西柏林问题进行谈判的反对态度。美国为了利用西德阻挠戴高乐的“小欧洲”计划，并且诱使西德同意美国在东西方外交上的领导地位，也在西柏林问题上迎合了西德的某些意见。在不久前的北大西洋集团雅典会议上和在腊斯克访欧时，美国提出了同“盟国”分享核武器分布情报及所谓“多边核力量”的建议，这些虽然是为了诱骗英、法放弃“独立核打击力量”而设计的方案，但是它对西德进行原子武装却多少有点好处。

西德和法国的关系也不是十全十美的。

在诸如欧洲统一、核武器等问题上，巴黎和波恩的矛盾也十分显著。更重要的是，法国和西德都想把对方作为自己争取大国地位的垫脚石，因此，它们彼此对于对方超越自己之上都是不乐意的。针对戴高乐组织以法国为领导的“小欧洲”活动，西德报纸不断警告法国不要做得太过分，以免西德“同美国站在一起而反对法国”。很明显，阿登纳政府正在利用它一方面同法国、一方面同美国的那种又勾结又矛盾的关系两面渔利。

腊斯克正是在这种矛盾重重的形势下，匆匆地在波恩走了一个过场。如果说经过美国国务卿一番游说，这些复杂的矛盾就会烟消云散，那又有谁能够相信呢！

